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석사학위논문

美中竞争2050

(미중경쟁 2050 翻譯論文)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한중과

오명화

2022년 2월

美中竞争 2050

(미중경쟁 2050 翻譯論文)

지도교수 송현선

오명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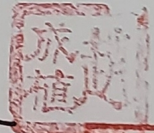
이 논문을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으로 제출함

2021년 12월

오명화의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을 인준함

심사위원장

趙成植



위

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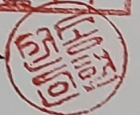
金中賢



위

원

宋政圭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2021년 12월



目录

第一章. 摸索分阶段扩大和妥协	2
第二章. 尖端技术——ICT(5G)	14
第三章. 尖端技术——半导体	39
第四章. 价值和规范——价值和规范竞争	60
第五章. 价值和规范——政治体制和理念竞争	84

第一章 美中竞争2050:摸索分阶段扩大和妥协

何英善 (하영선) (EAI, 首尔大学)

孙悦 (音) (손열) (EAI, 延世大学)

一、 研究摘要(executive summary)

本文研究目的：第一，预测2050年的中美关系，剖析两国未来竞争走向和摩擦领域并探究其中缘由。第二，中美较量中，双方可能采取的牵制措施与底牌及相关政策评估。第三，中美相互妥协，通过合作为创造亚太新文明奠定基础。

中美战略竞争将受两国GDP和军费开支变化影响。第一阶段（中期），中美GDP在2030年发生逆转，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遏制中国崛起，并在价值和规范领域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第二阶段（中长，中国军费支出在2040年超过美军总支出三分之二水平。此外，为牵制中国的迅猛发展，美国将在台海、南海等热点地区(hotspots)引发军事冲突。中国选择通过货币竞争削弱以美元为主的货币储备体系，挑战美国霸权，与美国形成激烈对抗。第三阶段（长期），到2050年中国军费支出与美国齐平，双方在尖端科技、能源、货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会最终聚焦至军事领域，从而导致两国在军费支出、武器装备、军事战略制定和组建军事同盟上产生激烈碰撞。

然而，在尖端技术、意识形态、能源和货币等领域，美国却拿不出遏制中国的法码。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的限制尖端技术出口、反华供应链联盟、互联网金融管控、限制中国海上运输、中国人权问题，以及批判共产党一党专政等一系列策略终将面临瓶颈。这是由于美国采取的上述措施，给双方带来了同等规模的损失。到2040年后，中美军费支出持平，双方将在军事安全领域展开殊死搏斗。届时，两国正式亮出军事底牌，攻进对方本土作战，最终走向“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局面。为避免一损俱损，最终双方将选

择妥协退让。

为避免短兵相接的情况发生，中美会历经相互施压、成本上涨、危机迭起、相互妥协等阶段。如果中美两国的战略发展基调不发生改变，那么其自身和周边国家都将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苦果。因此，包括中美在内，韩国等周边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需及时调整步调，共同推动构建21世纪“竞争、合作、共赢”的多边发展新体系。

二、研究假说及分析

课题研究一：中美战略竞争是否会演变为对立和冲突？

假设1:2030年中美GDP发生逆转，两国冲突主要围绕尖端技术、货币、能源等领域展开；2050年中美军费开支齐平，两国在国家安保领域产生分歧并走向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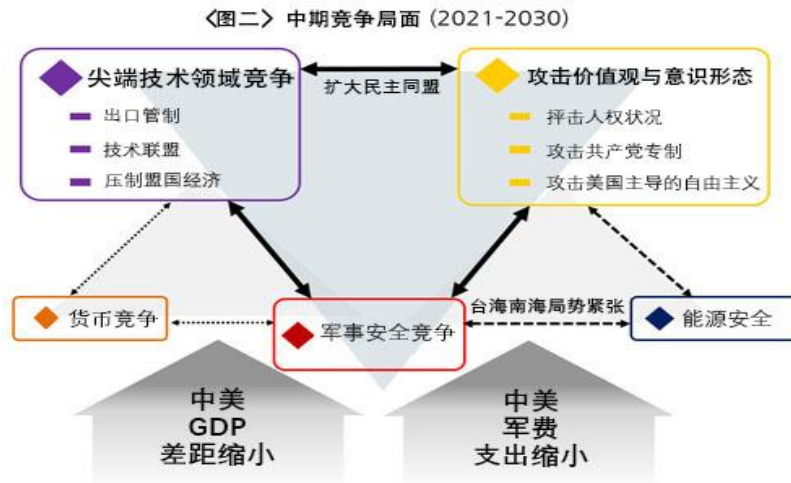
美苏冷战时期的竞争与对立，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到2050年中美竞争步入常态化，两国之争从最初的贸易领域延伸至尖端技术、能源、货币、价值观、国防安全等领域，表现出跨领域、阶段性的特点。（图一）

2030年中美GDP逆转、2050年中国在军费支出和军事实力上追平美国，都将成为重大历史拐点。第一，预计在2030年前后，中美经济实力并驾齐驱，两国在技术、经济、价值规范等领域产生激烈碰撞。第二，到2050年中美军费支出规模难较高下之时，两国在军事领域爆发冲突。2040年双方步入战略转折期，货币竞争伴随军事竞争而来，而中美之间“真正的较量”也在同年围绕国家安全领域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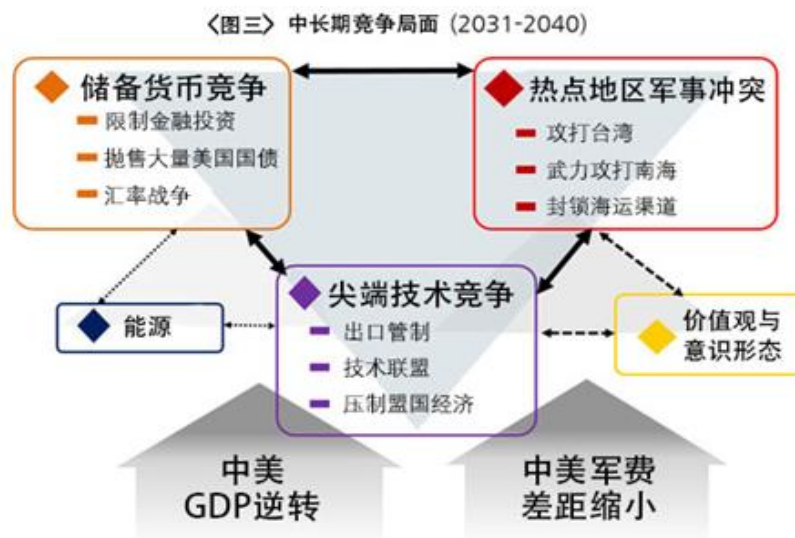


此时，美国既想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又想阻止中国发起的挑战，因此美国将采用综合性战略应对中美竞争、分歧与合作共存的局面。中国则希望通过“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美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贯强调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核心利益，并表示若美方侵犯其核心利益，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击。

到2030年中美差距未缩短之前，只要美国不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就不会向美国发起军事挑战。美国也将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秩序构建等领域，尽可能与中国保持一种合作关系。同时，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大环境中，美国将在保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国人权状况以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展开猛烈抨击。（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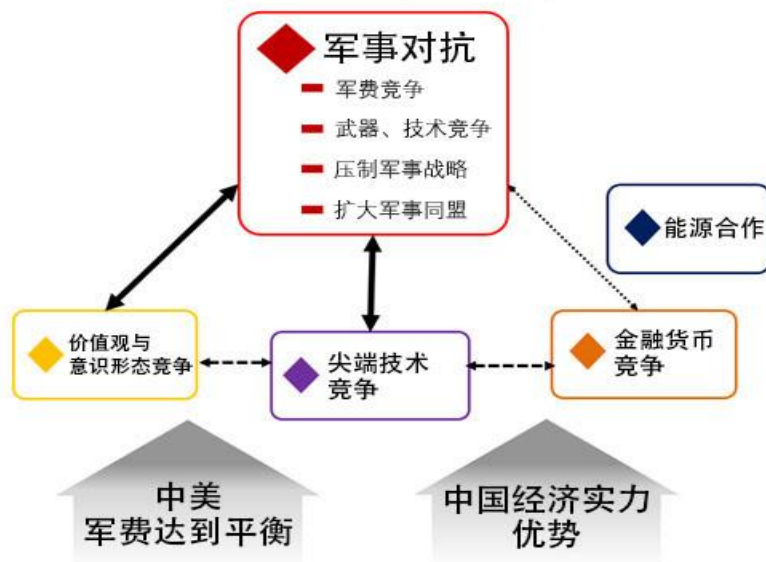
到2040年中国经济实力赶超美国，且军费支出超过美军总支出过三分之二以上。此时，中国将极力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冲突与对立由此引发。例如，中国将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向美元霸权发起挑战。为牵制中国发展，美国极有可能利用军事优势施压中国。如“图三”所示，台海和南海等热点地区恐沦为冲突高发区。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从逐步缩小转为平衡对等时，各领域的博弈均会被视为触及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导致两国正式进入军事对抗阶段。到2050年两国将在军费支出、国防战略制定、高科技条件下尖端武器系统创新、盟友体系的强化与扩大等层面展开角

逐。以战略同盟为例，双方会从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入手，对敌方实施战略性分化，动摇其正当性根基，并展开价值规范竞争。

〈图四〉 竞争常态化局面 (2041-2050)



课题研究二：中美是否拥有遏制对方的有效措施或筹码？

假设2：中美双方在尖端技术、意识形态、能源、货币等非军事领域，均不具备可以一招制敌的压倒性优势。

中国的均衡发展战略即将步入正轨，而美国将在此前动用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打压和阻止中国的发展。同时，为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挑战美国霸权的正当性，中国正在酝酿用意识形态和具体措施制衡美国。双方的如意算盘能否打响，还要看他们手中的有效筹码。

总体来看，美国在贸易、尖端技术、能源、金融货币、军事安全等领域完全可以碾压中国。但是，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美国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无法实现完全“脱钩(decoupling)”，便无法打出打压中国的筹码。随着中国不断累积对美

筹码，预计双方将因此付出较大代价。然而，待中国的GDP赶超美国且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时，美国若要在经济技术层面打压中国恐怕会得不偿失。

在尖端技术领域，为保证自身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占据竞争优势，美国正在阻止中国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企图剔除中国5G网络设备。美国采取的扩大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对华投资、建立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格局等政策措施，虽然可以帮助其提升自身实力，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降低对华依赖，但从根本上看，这不仅难以给中国造成致命性打击，反而会促使中国降低对美依赖，并助推“一带一路”参与国与中国一道构建独立的5G生态系统（李承柱第二章）。

以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半导体为例，美国正加大力度提升以本国为主的供应链稳定性，并在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阻止中国半导体的崛起。美国试图凭借其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优势来打压中国，但如果卡锁中国的致命点(chokepoint)，限制极紫外线(EUV)光刻机，氟化氩(ArF)准分子激光器，深紫外线(DUV)光刻机等设备，无异于封锁了苹果、英特尔、高通等美企在华的销售市场。美国认为与其自断后路，不如加强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供应链合作，在牵制中国的同时，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和制造业产能，使中国的半导体战略举步维艰。为有效应对美国的牵制措施，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核心技术、并建立红色（RED）供应链（裴英子第三章）。

能源领域亦是如此，美国试图借助军事力量控制中国的能源运输渠道，通过提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的经济成本。不过，在全球经济高度依存的当下，这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经济，还会引发运输航道上各盟友国的不满，使美国受到舆论谴责。

在过去，大国之间的货币战争都会演变成军事战争，从这点来看，中美货币竞争将成为衡量霸主之争的风向标。为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必须捍卫美元在国际货币

体系中的地位。同样，美元的霸权地位，也是导致中美权力不对称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将不断挑战并削弱美元地位。到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时，双方将就货币霸权问题展开激烈对抗。具体表现为，中国反复、大量地购买和抛售美国债券，致使美元价值不稳定；美国仰仗互联网金融优势，对中国采取限制投资或撤回投资的极端措施，阻止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至此，中美双方“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和“迷你相互确保摧毁(mini-MAD)”被提上日程，任何一方都无法一招致胜。到2040年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由于全球市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路径的高度依赖，人民币国际化恐难独当一面，预计美元将维持其主导地位不变，或与其他货币组成新的国际复合货币体制（李容旭第六章）。

最后，中美将就争夺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正当性上捍卫本国地位。美国将借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围堵中国政府，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专政制度。为回击美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发起的攻势，中国将攻击美国式民主制度的缺陷和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困境，进而重构中国文明新秩序（金轩俊第四章，李东律第五章）。

两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将使双方在争夺区域和全球霸主地位时的合法性(delegitimation)遭到质疑，从而导致霸权分化(deconcentration)。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不可信国家，并在国防安全、技术生产、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排挤中国。因此，两国将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家经济和安全问题挂钩，维持双方的对立局面。

归根结底，中美在经济、技术、能源，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均不具备一招制敌的筹码。长远来看，随着两国在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摆脱相互依赖并逐步实现脱钩时，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摩擦将随之浮出水面。当两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

攻防愈演愈烈时，双方将深陷认同感与可信度频繁降低的漩涡中。

课题研究三：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

假设3-1：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通过制造军事冲突先发制人，以遏制中国崛起。

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审视过往的霸主之争会发现，在多数情况下，挑起军事冲突的并非崛起国，而是霸权国。随着中美两国在贸易、货币、技术、能源等多领域开始产生摩擦，为阻止中国在军事及其他领域赶超自己，美国将优先选择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

与美军相比，中国整体军事实力相对落后，故中国不会轻易发动军事冲突。不过，一旦美国触碰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三大核心利益时，不排除中国动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针对台海、南海等热点地区问题，中国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超强、短快的军事策略维护国家利益。

如果台湾地区企图仰仗其强劲的半导体产业和经济实力，联手美日宣示主权图谋独立，那么中国必将在美国进行外交和军事干预之前，就付诸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若美国察觉到中国存在动用武力的迹象，美国将把海军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区，调配驻日美军进驻台湾，加强对台作战准备，中美两国军事较量由此升级。

此外，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在南海的军力部署，其中包括占世界贸易量60%的远洋运输航线，为有效控制该地区吞吐量，中国或优先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国则会对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对华敌对国家和地区持续给予战略支援，并增加南海“航行自由行动”频次，迫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

若台海和南海局势持续升温，中美冲突或一触即发。尤其是台湾，受其战略性作用和地理位置影响，双方一旦发生冲突，任何一方都不会妥协，甚至还会导致冲突地区局势失控。中美战略核力量已十分接近，两国爆发冲突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就南海问题而言，若美国不介入，中国结束地区纷争的可能性较高，反而导致冲突几率升高（郑宰盛<音>第六章）。

假设3-2：在中美军事竞争中，“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会促使双方投入大量尖端武器并发动核打击，致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核战，中美两国将通过谈判或适度退让避免该情况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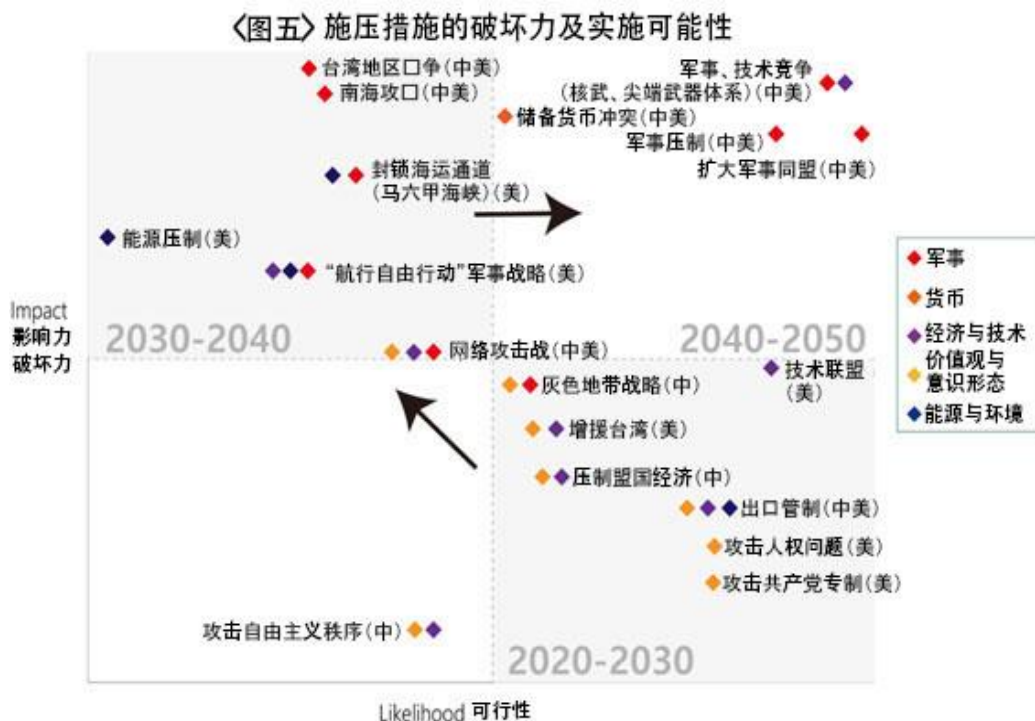
到2040年，悬而未决的台海和南海局势一旦突变，中美恐直接开战。中美竞争与当年美苏竞争的相似点在于对抗的多面性，包括通过军备支出和武器开发迫使对方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依靠军事战略扩大军事同盟，瓦解对方军事阵营等。另，中国不仅将在国防开支上追赶美国，还会不断提升海军、空军力量，持续增加尖端武器和战略武器投入。继扩充核弹头数量后，中国还会加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并在进一步增强多弹头导弹、氢弹弹头等核威慑力的情况下，直击美国本土引爆全面核战。

就综合实力而言，美国还是略胜中国一筹，不过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两国的战火硝烟将从亚洲蔓延至美国本土，局部战争演变成全面核战。若是中美全面打响核战争，“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战略遂被启动，待双方疲于应战之时则会效仿1970年的美苏争霸，签署战略核武器削减协议。

随后，双方会在保留摧毁对方最基本战斗力的同时，控制军备增长，减少核武器并制定战略武器相互合作机制。当两国在军费开支、军事科技与军事装备创新、国防战

略发展、战略盟友合作等多方面旗鼓相当时，才会在军事安全领域达成统一（郑宰盛〈音〉第六章）。

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需要中美两国依据法律准绳和规章制度构建一种冲突化解机制。在美苏两国正式宣布裁军之前，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和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原则，在建立军事信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原则并非由美苏两国制定，而是在欧洲多国的共同参与下达成多边协议。为推动亚太地区和平进程，中美两国应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周边利益相关国家，就军事、科技、金融、贸易和价值规范等问题开展多边合作，并在此基础上织密综合安全网，构建亚太新秩序。



作者介绍:

何英善__EIA 理事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历

任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院 教授，首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学研究所所长，韩国和平学会会长。主要著书及编著有《综合世界政治论：战略、原理和新秩序》，《韩日新时代和共生的综合关系网》，《变换的世界政治》，《美中之间构建亚太秩序竞争》等。

孙悦（音）__EIA 院长，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 教授，芝加哥大学 政治学博士。著书有《危机之后韩国的选择》（2020），*Japan and Asia's Contested Order* (2019, with T. J. Pempel), *Understanding Public Diplomacy in East Asia* (2016, with Jan Melissen) 等。

第二章 中美竞争2050:尖端技术领域 ICT(5G)

李承柱 (音) (이승주) (EAI, 中央大学)

一、序论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已从贸易战扩大为技术战。所谓5G竞争已不仅限于IT及其相关技术领域，而是在5G技术竞争过程中更加注重产业战略、双边互动、多边国际合作等，为研判未来技术领域竞争方向发挥着试金石作用。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5G之争是灵活多变的。中美在5G战的交锋中都在尽量避免采用施压对方的“一边倒”外交战略，而是通过提升国内技术创新和产业力量，对外扩大与同盟国、伙伴国之间的合作来谋求发展。

可以说，一味地单方面攻击在5G竞争中取得的战绩、面临的局限性推动着5G战略升级。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实施单方面的制裁和打压，致使华为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但是在5G角逐中，华为已在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有了相当大的占有率。而且美国也没能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所以特朗普的这一政策是否成功，对此存在不同的评价(Drezner2019)。拜登政府的5G战略升级，大体上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为了弥补一味地单方面制裁所存在的局限性，拜登政府试图把5G战略与尖端产业供应链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拜登政府上台后立即着手“100天供应链审核”(100-Day Supply Chain Review)，企图通过限制供应链牵制华为，这远比直接制裁5G网络设备，效率更高。因为美国企业掌握着尖端产业核心技术和装备等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因此这相当于采取了供应链压制战略(Farrell and Newman 2019)。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战略具有打击范围小，制裁力度大(“small yard, high fence”)的优势(Zhihang and Walsh 2021)。而且，反应了中美两国难以实现“脱钩”的现实，供应链战略作为一种定制型战略，在应对局势变化上更加灵活。

第二，在5G竞争长期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都在加强本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如果说，初期的5G交锋表现为美国阻止华为安装5G网络设备以及应对中国的措施，那么将5G战略与本国创新技术和生产力紧密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拜登政府2021年6月宣布，计划在5G、AI、量子计算等领域投入1721亿美元规模的联邦R&D基金。美政府之所以决定将R&D预算大幅投入尖端产业领域，不仅意在确保5G装备的市场占有率，更在于培养未来技术产业竞争力，从而在5G交锋中赢得胜利（Vincent 2021）。中美两国的较量着眼长远，归根结底都为锁定6G竞争优势。

第三，中美在5G竞争中强调国际合作。为促进技术与生产力的整合，美国积极主导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等国际合作，摒弃了过去施压盟友的策略。拜登政府主张与民主主义国家加强多边合作，中国则优先面向“一带一路”参与国开展合作，中美两国都在积极应对彼此的国际战略协作

二、美国5G战略——从战略封锁到合作创新

（一）5G竞争战略的基本方向

在与中国开展5G争夺上，美国的主要目标有三个方面。首先，预计5G在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中迅猛发展，美国打算从根本上解决来自中国5G的安全威胁。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一直推行这一目标，为此也不惜与盟友产生纷争。美国认为5G之争不仅关乎技术，还事关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表示，5G技术不仅意味着更快捷的通信服务，在21世纪的网络世界，包括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等领

域里5G还将发挥主杆作用。因此确保5G网络安全迫在眉睫。美政府认为要享受5G带来的美好未来，“信任”（trust）、“缓和”（relation）、“伙伴关系”（partnership）必不可少。

其次，在5G领域美国的另一个目标是阻止中国5G技术发展，事实上试图对5G网络的中美两大阵营之间实行“脱钩”。在全球5G通信设备领域，华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稳居第一。为阻止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持续上涨，美国加强与爱立信（Ericsson）、诺基亚（Nokia）、三星电子等的合作来替代华为。此外，美国政府要求欧洲及其亚洲同盟国暂停使用华为5G网络，同时，通过开发ORAN（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s）提出了开放且具有性价比的新方案。

最后，从中长期角度出发，增强国内创新力量，保持5G技术竞争优势。5G技术不仅波及国家安全，给经济和产业领域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预计到2040年，中美双方将主要围绕尖端技术领域开展激烈角逐。美国政府认为，无人驾驶汽车、移动设备、互联网服务等尖端技术的关键核心在5G，因此确保技术竞争力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华为5G通信优势明显，短期内美国一方面选择利用国际合作来提升5G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战略出发尽力主导6G竞争。在2021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上，拜登总统宣布两国将共同投资45亿美元，用于6G的研究、开发、测试和网络安全全部署（Nikkei Asian Review 2021/4/18）。

（二）5G战略的演变过程

1、制裁弹性增加

在5G竞争中，美国动用的施压手段包括限制出口和加强国际合作。2019年5月，

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Entity List），要求未经政府批准不得向华为提供美国技术，掀开了对华为制裁的序幕。但由于美方企业可以申请“临时许可证”，因此与华为的交易往来尚未被彻底切断。实际上，自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6个月后，2019年11月开始美国商务部不得不给这些受到严重打击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发放“临时许可证”。

2020年上半年，美国再次加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一些主要国家针对华为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中美5G之争进入了新发展阶段。2020年5月，美商务部对华为的交易限制措施再次升级。特朗普政府规定，任何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的公司不得向华为出口半导体。这一措施不仅适用于美国企业，还适用于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的外国企业（Whalen 2020），等于从限制华为的5G供应上加大了制裁的范围与力度。

然而，从出口限制和管控措施中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一贯性。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暂停了对华共计1190亿美元的出口许可，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反而又给向华为出口的企业发放了870亿美元规模的“临时许可”

（Freifeld 2021）。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华出口限制的关键目标——华为展开了猛攻，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美企的利害关系不得不放宽出口限制。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行政令，对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四种关键产品进行为期“100天的供应链审查”，并修改出口许可管理制度，限制华为5G设备的零部件供应，持续对华为采取一系列高压措施。2021年3月，拜登政府限制相关企业向华为供应“可用于”5G设备的产品，对华为加紧了新的制裁。这一措施同样适用于已取得出口许可并与华为签署现有合约的企业，此举表明拜登政府的立场十分强硬。

2. 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抗格局

一直以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与美国保持一致步调，但随着欧洲国家在2020年初接连与华为签订5G网络建设合约，导致特朗普政府2020年上半年在拉拢友邦国家，扩大反华为作战面上受阻(Sanger and McCabe 2020)。截止2020年上半年，美国寻求的国际合作依然局限在其主导的“五眼联盟”上，因此拉拢英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便成为了美国加紧国际合作的战略途径。拜登政府倡导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理念，对华为的制裁也将保持这一政策的总基调。

英国政府在2020年7月宣布停止采购华为设备，美国所倡导的国际合作战略开始初显成效。2020年上半年，以澳大利亚、日本、英国为首的8个国家宣布禁用华为5G网络设备，随后印度、法国、越南、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开始跟风，至此，以中美5G之争为焦点的国际局势开始发生变化。¹ 不仅如此，除包括英国和西欧等与华为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国家更弦易辙外，曾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表态的意大利也决定排除华为5G设备，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少冲击。

不难看出，在英国表态后，一些主要国家的政策基调也随之动摇，围绕华为展开的中美技术竞争态势由此发生转折。为确保网络运营商的商业利益与5G供应链安全风险可控并驾齐驱，英国在使用5G网络时对“基于信息访问”(an intelligence-led approach) 模块进行了设置。同时，为监管华为设备的潜在风险，英国在2007年引进华为网络设备后，于2010年设立“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Huawei Cybersecurity Evaluation Centre)”。2020年1月，英国政府表示华为网络设备的参与占比不得超过35%，并将其排除在5G关键网络之外，以此来限制“华为风险”。

到了2020年7月，英国却以影响基建为由，拒绝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这样

¹ 匈牙利、冰岛、荷兰等北约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美国同盟国正在使用华为设备(Sacks2021)。

的反转，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华为实施的新一轮制裁，以及中美技术竞争的加剧。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的政策反转也没有在国内激起任何大的波浪。此前，英国的通信运营商曾表示，禁用华为设备会带来经济和时间上的损失，因此反对剔除华为5G设备。但英国政府实施的“35%”政策，为运营商提供了充足的应对时间，也为逐步剔除华为铺平了道路。

英国政府禁用华为的这一政策决定，不仅没有遭到运营商的强烈反对，反而依靠调整供应链结构巧妙地化解了危机。早些时候，新西兰、日本、泰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就以安全为由剔除了华为，英国则在政策调节上与美国及其伙伴国达成了相同步调(Naylor 2020)。

结果英国在政策反转后，还敦促欧盟成员国调整5G供应企业，致使欧洲国家对华为的立场开始摇摆不定。不过，欧洲国家与英国一样，在决定禁用华为上采取了谨慎的立场。法国要求本国的通信运营商尽量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另一方面却未停用现有技术，大部分欧洲国家则选择把华为间接排除在外。英国则提议组建“D10”联盟，以便持有相同立场的国家(like-minded states)能够抱团对抗华为。

3、战略性“回流”与推进国际合作

观察拜登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5G战略区别，要从战略的延续性和差异性入手。预计，拜登政府或将战略性“回流”(reshoring)与推进国际合作均等化作为抓手。众所周知，拜登政府正在对包括5G在内的主要领域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审查旨在掌握和分析主要领域供应链中存在的风险，并制定应对策略，而供应链优化重组的核心在于“回流”。“回流”可将供应链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同时还能在国内创造优质的就业岗位，从而保证美国中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拜登重视国内政治的战略定位。

战略性“回流”的目的是在关键技术和制造业上摆脱对华依赖。从这一点来看，拜登政府所追求的供应链重组战略本质为弹性(resilience)、安全(security)、多元(diversity)，而非以往的“脱钩”(decoupling)。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在美国商工会议所发表演讲时表示，中美完全脱钩(fully decouple)不仅“不现实”，还会“适得其反”(ultimately counter-productive)，故拜登政府需加强与同盟国的密切沟通，建立世界技术标准体系，制定新的战略方案扩大影响力(Shalal 2020)。

“回流”虽符合拜登政府的本土政策，但在突破中美技术竞争局面上存在局限性，因此应与民主国家就供应链重组上保持密切合作。另外，“回流”具有缩短供应链差距，降低供应链安全风险的优点，但供应链越集中风险也会越大。综合来看，拜登政府若要增加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多元化不可或缺，考虑到中美地缘政治因素，拜登也必须与盟国及伙伴国开展国际合作。

与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政策的特朗普不同，拜登将在开展国际合作上付诸更多精力。除当前的“五眼联盟”(Five Eyes)外，拜登政府很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因为拜登清楚，只有得到盟国及伙伴国的助力，才能更好地牵制中国，同时利于提升供应链弹性。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实现5G网络高效覆盖，构建5G生态系统

在应对美国发起的5G挑战时，中国采用扩大华为5G网络设备覆盖，建立独立5G生态系统等策略，避免与美针锋相对，这也是中国基于对中美5G对抗长期性而做出的战略决策。第一，中美贸易战初期，面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针对华为

在内的中企发布限制交易令时，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不过，在美国一边限制华为出口，又同时发放“临时证”时，中国选择改变强硬策略。中国的5G市场正以远超他国的速度迅猛发展，面对美国的制裁与打压，中国选择向“一带一路”参与国出口华为网络设备，采用“迂回”战术进行反击。

第二，为应对美国制裁长期化，降低对美依赖，中国正构建一个独立的5G生态系统。例如，华为正在独立研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并尝试建立一种基于5G的物联网系统，加强产品和零部件的开发与生产能力。在推动技术、生产和消费的生态系统形成方面，政企合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此过程中，美国所诟病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论断，加剧中美冲突。

(一) 抢占国内市场

受美国打压影响，华为的业绩增速大幅放缓，至于能否阻止华为的技术创新还不得而知。另，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措施和国际合作致使华为在设备出口，5G智能手机领域陷入困境，但华为利用本土优势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并通过布局物联网等方式向多领域延伸。在生死存亡之际，华为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内对外战略，将制裁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Pham 2020)。特别是在美国制裁升级，开始对华为供应链下手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华为的供给能力，间接导致第三国在选择使用华为网络设备上更加慎重。

美国加大对华为的制裁力度，华为则依靠强化本土市场寻找出路。华为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比例从2019年的59%上升至2020年的66%，而随着欧洲地区的销量下滑，中东和非洲(EMEA)国家的销量从24%降至20%，美洲地区同样从6%减少至4%(Knight

2021)。尤其在销售额锐减的移动电话板块，2020年第四季度销售额降幅达41.1%，仅实现中国区的业务增长。据华为年度报告显示，欧洲、中东、非洲、亚太和美洲等地区的销售额降幅从8.7%升至25%(Kwan 2021)。²

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正是凭借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才得以在长时间内抵御住美国的打压。中国政府表示，预计到2025年国内5G用户数将占全球总数50%。以智能手机为例，受美国制裁和新型冠状病毒等因素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华为的全球市场销量为7,260万部，同比下降18%。中美贸易战开打时，华为2018年第一季度的国内市场份额为11.8%，美国决定加大对华打击力度之际，华为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市场份额增至17.8%(Vendor Data Overview 2020)。

短期来看，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将有助于缓解美国和一些主要国家制裁所带来的冲击。2021年开始亚洲和西方国家获准引进5G通信服务，但是中国5G服务用户人数预计到2025年为止将达到8亿，占全球总数的50%。因此，只要华为在未来4到5年时间里保证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持续增长，依然可以应对美国的制裁重击(Kawakami 2020)。

中国在5G通信设备领域亦是如此。截止目前，中国已投入402亿美元(Hong 2021)用于铺设5G网络，通过推动5G网络与相关业务发展，能够让华为等中国网络设备企业抵御美方制裁冲击。截至2020年4月，中国最大移动通信公司——中国移动在28个城市建立的基站中，华为的设备份额占57.2%，中兴和大唐分别占28.7%和2.62%，也就是说华为等中企在本土市场占有率已高达89%。

中国的市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半导体供给，美国主导的技术同盟能否实现

² 据华为称，未能接入安卓生态系统，致使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销量下滑。

中美“脱钩”(Decoupling)有待观察。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和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出具的报告指出,在包括半导体行业在内的全球价值链中,美国所追求的“自给自足”(Self Sufficiency)既不可取,也不现实。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若中美在半导体行业“脱钩”,或将导致美半导体行业规模缩水30%。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报告强调,如果美国不再进口半导体,而是将其全部带回本国生产,那么生产成本会上涨35-65%,且依然无法自给自足。在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两国高度依赖,过度干预和人为“脱钩”将使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2019年6月,在中国移动进行第一阶段5G网络铺设时,华为和中兴设备分别占51.7%和3.1%,此时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约27%,而占33.8%和10.2%的爱立信和诺基亚的市场份额却下滑32%。在中国移动第二阶段5G建网业务中,外国企业的占有率大幅下滑,而华为、中兴、大唐等中国企业的份额有所扩大(郭艺智<音>2020)。³在此过程中,中国消费者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忠诚度显著增加。其中,华为用户的忠诚度增幅最为明显,在2020年第一季度复购率达到52.4%,较2019年同期增长10%。与此同时,用iPhone替代华为智能手机的比例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22.2%,降至2020年同期的14.7%。

(二)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为助力华为5G设备出口,中国正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Sacks 2021)。正在引进华为网络设备的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等地区中,大部分均未明确表明剔

³ 诺基亚在中国(含台湾地区)的市场份额仅为6%(Satake2020)。

除华为设备，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将就美国迁回亚洲和欧盟等地一样，扩大华为设备的出口。由于已经引进华为5G网络设备或决定排除华为设备可能性较低的国家还有很多，因此中国将围绕此类国家提高市场占有率。中国正将“一带一路”从传统基建转型为数字基建，因此“一带一路”伙伴国也将被纳入其中，至此引进华为设备将被上升为国家战略。

目前，剔除华为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从中长期来看，待中国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市场步入正轨之时，中国或向“一带一路”伙伴国实施5G战略布局。《中国制造2025》提出，中国将提高国产化自给率，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和尖端产业领域对外依赖，那么，美国制裁华为无异于加速了《中国制造2025》的步伐(Bajak 2019)。以卫星产业为例，美国在人造卫星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实施着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但相关企业“绕道而行”不与美企交易，最终导致美市场份额缩水。一些美国公司正在担心5G市场也会发生上述情况。

(三) 构建独立生态系统，助力多元化发展

中国正以移动、联通、电信为依托，迅速扩大本国5G通信市场，带动5G网络设备、通信服务和智能手机等的覆盖，从而建立生态系统战略。同时，为实现到2020年5G服务大规模商用化，确保5G用户数达到1.2亿，中国政府共投入1803亿元人民币(约合258亿美元)，投资规模较2019年翻了三倍。根据规划，将开通30万个5G无线网络基站，华为等中国通信设备企业有望成为受益者(郭艺智<音>2020)。

面对美国持续两年的制裁，华为开启自救模式，通过自主研发供应链，推动建立数字技术生态系统，以变化应对危机(“Huawei to continue Diversifying Supply

Chains, discusses future prospects” 2020)。在美国的步步打压下，华为不得不采取核心技术自给自足战略，同时华为意识到供应链研发及多元化发展势在必行。而美商务部之所以把计算机、通信、电子、半导体零部件及软件和技术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亦是认识到将华为海外供应链纳入管控的必要性。结合自身情况，华为着重对鲲鹏、昇腾、HMSCore（华为移动服务）、鸿蒙、华为云和MDC（智能驾驶计算平台）等6大数字技术生态进行升级(Dan and Yang 2021)。另，智能手机不过是华为业务的一部分，其核心仍在通信和云服务，因此华为通过自救措施便可应对美国发动的强硬攻势。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是连接物联网设备的关键。华为此前预计，到2021年底鸿蒙操作系统将搭载3亿台数字设备，而将这些设备串联起来的，就是华为“1+8+N”战略架构(Hong 2021)。⁴此外，电商企业JD.com也推出了鸿蒙OS系统专属APP应用(Dan and Yang 2021)。华为在开发AR/VR耳麦、平板、笔记本、电视、智能手表、音响、无线耳机等智能产品的同时(Liao 2021)，还在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汽车等业务领域进军。据悉，华为将投入10亿美元用于智能电动汽车部件研发，为此将联合北汽、广汽、重庆长安等中国汽车制造企业(Shed2021)。不仅如此，华为还将业务扩大至采矿业、交通、医疗保健等新兴领域，以弥补智能手机业务收入下滑，抵消美制裁影响。

四、5G与中美科技战

⁴ “1”代表智能手机，“8”代表华为数字设备，“N”代表支持华为解决方案的第三方设备(Hong2021)。

(一) 战略性“再挂钩”确保5G时代影响力

今后，为确保本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减少对外依赖，中美双方或将寻求战略性“再挂钩”。降低对外依赖的关键在于持续增强国内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产能的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遏制他国影响力的扩大。至此中美经济会发生变化，中美之间核心技术和尖端产业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将降至更低，而在国家安全和技术领域，围绕着敏感度相对低的部分将试图再次“挂钩”。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的变动随之引发全球化战略重组(strategic reglobalization)。

首先，战略性“再挂钩”要求拜登政府提升本土的创新能力，以缓解主要产业面临的安全威胁。特朗普任期时，中美战略竞争主要在限制中国技术赶超美国，而拜登政府除延续特朗普政策外，更加重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确保和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基于此种原因，拜登政府决定投入3250亿美元创新研发(research and innovation)基金(Kelly and McCabe2021)，通过提升创新能力，确保5G行业竞争优势，进而争夺6G技术，实现太空军事领域的突破。从美对华政策走向和科技竞争战略层面分析，拜登政府将引导涉及国家安全和碳中和政策的行业领域“回流”，同时要求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增加设施、扩大生产。

其次，拜登政府的5G供应链战略，侧重平衡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供应链战略的形成以产业联盟为基础，只有当产品和服务与消费场景相融合时，供应链上的各环节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此外，拜登政府在深化国际合作中推动生产和消费相结合，将促使同一条供应链中的国家联合起来实施对华制裁。当身处相同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之间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时，既可以抵挡中国的反制措施，还能拉拢更多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战略联盟。

拜登政府倡导的区域多边合作主要围绕民主国家进行。为提升电信网络、云端、数据分析、移动应用程序、物联网、5G技术等的安全系数，美国务院和观点相近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就与“可信任”供应商合作一事进行了广泛沟通。为此，美国务院宣布推进“5G清洁网络”(5G Clean Networks)倡议，旨在建立安全、可靠的国际公认“数字信任标准”(Digital Trust Standards)。早在2019年5月，为强化5G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欧盟和北约等30余国就曾发布“5G安全布拉格提案”(Prague Proposals on 5G security)。在“清网”方面，数字信任标准可以说是“布拉格提案”的升级版(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在5G合作上，英国曾提出，D10联盟可应对网络设备和供应链中存在的漏洞(Erik 2020)。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号召，G7成员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民主国家D10联盟(Khanna2020)，旨在摆脱对华为5G的依赖。约翰逊政府认为，D10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很大一部分，联盟国家在保持内在整体性的同时，还能携手应对5G技术和关键供应链上出现的挑战。英国政府对华为进行的新一轮安全审查和评估，最终导致其开始加强与民主伙伴的合作，拜登政府将积极参与其中。

另外，拜登政府倡导以美日印澳“四国联盟(Quad)”为战略中心，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四国联盟”将举行5G技术峰会，拜登政府则会借助峰会平台推动其世界技术标准。此外，美商务部即将签署一项新规定，允许美国企业与华为一道参与国际标准化机构(Freifeld2020)。对照此前，在共同为下一代5G网络制定标准方面，美商务部一直禁止美企与华为公司合作。实际上，5G国际标准3GPP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时，Sprint、AT&T和First Net等美国公司并未参加，这导致美企在5G标准制定上逐渐被边缘化，而华为处于领先地位。

时至今日，美国逐渐意识到其不仅未能引领5G标准的制定，也未能与其盟友开展

有效合作。因此，美国开始通过与盟国合作，积极参与到5G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并阻止华为及中国国有企业持续发展壮大。为主导5G国际标准的制定，美国开始与一些主要国家开展合作，如，美国公司牵头成立的“Open RAN联盟” (ORAN Policy Coalition)。不过，若中美5G之争不能画上休止符，6G时代标准或出现两极分化，进而导致国际标准沦为一纸空文(Doffman2020)。

为有效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中国将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国采用华为5G网络设备，继续扩大其5G竞争力和影响力。如“图一”所示，在“一带一路”参与国中，中亚、非洲、南美和欧洲部分国家正在或将长期使用华为设备。

图一：使用华为设备国家和未使用华为设备国家



剔除华为设备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瑞典、波兰、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

未使用华为设备国家：柬埔寨、沙特阿拉伯、阿曼、乌兹别克斯坦、玻利维亚、

南非共和国。

或将继续使用华为设备国家：法国、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埃及、突尼斯、喀麦隆、加蓬、摩洛哥、肯尼亚、乌干达、安哥拉、纳米比亚、赞比亚。

虽没有正式宣布，但事实上在禁用华为的国家和正式宣布禁用华为的国家与日俱增。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国家坚持引进华为设备和选择继续使用华为设备，中国政府和华为也将以此类国家为重点，持续推进5G网络建设。不仅如此，中国政府正在落实多项政策激励措施，调动“一带一路”参与国引进华为5G网络设备。例如，中国向巴西提供新冠疫苗，巴西决定支持使用华为5G设备(Londoño and Casado 2021)。

短期来看，中美两国将展开激烈角逐。美国千方百计阻止使用华为5G网络设备，中美两国之间逐渐降低在技术和生产上的相互依存度。中长期来看，为争夺6G网络技术优势，中美将在不断加强创新力量，构建独立的技术生态系统，并将本国技术设定为国际标准而持续竞争。

（二）走向技术竞争时代

未来，中美技术之争将涵盖尖端技术及其安全性和国际标准制定，掌握多边机制主导权等方面内容。第一，5G等多领域的角逐若能告一段落，那么双方将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以确保各自在技术竞争中的优势。若角逐进入常态化，中美两国将致力于本土发展，以占据核心竞争力——尖端技术的制高点。

第二，随着技术兼容性不断扩大，中美两国对涉及安全领域的尖端技术将更加敏感，从而导致双边、多边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另外，5G齿轮的转动，推动着6G技

术被广泛应用，各类武器之间的性能被紧密连接，混合战争形态逐步显现。因此，对通信技术等尖端科技的创新不再只求提升，还讲管控。除争夺6G网络优势外，中美两国还将加大创新力度和前沿技术投入，在相互牵制的同时扩大国际合作。

第三，为制定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国际规则，中美将围绕制定多边机制展开激烈角逐。两用技术出口管制依赖与盟友的通力合作，因此想要把握尖端科技的流通，势必要争夺多边机制上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Apple, Huawei boost market share, as first-quarter China smartphone shipments fall: Canalys.” 2020. Reuters. May

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martphone-sales-china/apple-huawei-boost-market-share-as-first-quarter-china-smartphone-shipments-fall-canalys-idUSKBN22D44U>.

Bajak, Frank and Michael Liedtke. 2019. “Huawei sanctions: Who gets hurt in disput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2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tech/news/2019/05/21/huawei-why-facing-sanctions-and-who-get-hurt-most/3750738002/>.

Barkin, Noah. 2019. “Europe’s backlash against Huawei has arrived.”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27/europe-huawei-backlash-merkel-germany-summit/>.

Burkitt-Gray, Alan. 2020. “Exclusive: UK backing search for 5G and 6G alternative to Huawei.” June

8. <https://www.capacitymedia.com/articles/3825653/exclusive-uk-backing-search-for-5g-and-6g-alternative-to-huawei>.

Chikermane, Gautam. 2020. “The Huawei-decoupling continues: now, Italy rejects China Tech from its 5G.” October

24.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the-huawei-decoupling-continue/>.

Dan, Zhang and Yang Kunyi. 2021. “After 2 years of US ban, Huawei further speeds up self-rescue.” Global Times. May 17.

Farrell, 2019.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1): 42-79.

Feuer, Will. 2020. “Apple stock reaches all-time high after Chinese government data shows iPhone unit sales spike.” CNBC. January

9. <https://www.cnbc.com/2020/01/09/apple-stock-hits-new-all-time-high-on-china-iphone-sales-data.html>.

Freifeld, Karen. 2021. “Biden administration adds new limits on Huawei’s supplier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huawei-tech-idUSKBN2B3336>.

“Huawei becomes most loyal brand in Android as market share grows rapidly.” 2020. cnTechPost. May

5. <https://cntechpost.com/2020/05/05/huawei-becomes-most-loyal-brand-in-android-as-market-share-grows-rapidly/>.

Fonte, Giuseppe and Elvira Pollina. 2020. “Italy vetoes 5G deal

between Fastweb and China's Huawei: sources." Reuters. October

2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italy-5g-idUSKBN2782A5>.

Hong, Iris. 2021. "Diversification helps Huawei grow in 2020 despite US sanctions." Asia Times Financial. February

26. <https://www.asiatimesfinancial.com/diversification-helps-huawei-grow-in-2020-despite-us-sanctions>.

"Huawei Maintains Lead in Global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2021. March 15. <https://www.eetasia.com/huawei-maintains-lead-in-global-communications-equipment-market/>.

"Huawei to continue Diversifying Supply Chains, discusses future prospects." 2020. January

8. <https://www.gizmochina.com/2020/01/08/huawei-to-continue-diversifying-supply-chains-discusses-future-prospects/>.

Jiang, Sijia and Michael Martina. 2019. "Huawei's \$105 billion business at stake after U.S. broadsid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huawei-analysis/blacklist-mess-huaweis-105-billion-business-at-stake-after-u-s-broadside-idUSKCN1SM123>.

Kawakami, Takashi. 2020. "China closes in on 70% of world's 5G subscribers." Nikkei Asian Review.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5G-networks/China-closes-in-on-70-of-world-s-5G-subscribers>.

Keane, Sean. 2020. "Huawei ban timeline: FCC officially designates

Chinese company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June

25. <https://www.cnet.com/news/huawei-ban-full-timeline-us-restrictions-china-military-trump-executive-order-fcc-security-threat/>.

Krach, Keith. 2020. “Under Secretary Keith Krach Briefs the Press on Huawei and Clean Telcos.” June 25. <https://www.state.gov/telephonic-briefing-with-keith-krach-under-secretary-for-economic-growth-energy-and-the-environment/>.

Kwan, Campbell. 2021. “Huawei continued to earn profit in 2020 but did not see growth outside of China.” Zdnet. April

1. <https://www.zdnet.com/article/huawei-continued-to-earn-profit-in-2020-but-did-not-see-growth-outside-of-china/>.

Landler, Mark. 2020. “Boris Johnson Pledges to Admit 3 Million from Hong Kong to U.K.”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3/world/europe/boris-johnson-uk-hong-kong-china.html>.

Liao, Rita. 2021. “Huawei seeks growth in Internet of Things as phone business suffers.” March 31. <https://techcrunch.com/2021/03/31/huawei-iot-strategy/>.

Londoño, Ernesto and Leticia Casado. 2021. “Brazil Needs Vaccines. China Is Benefit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Lorel, Morris. 2019. “China’s Rigged Telecom Market Keeps Nordic Firms in Huawei’s Shadow.” News Editor. October

22. <https://www.lightreading.com/asia-pacific/chinas-rigged-telecom-market-keeps-nordic-firms-in-huaweis-shadow/a/d-id/755034>.

Loel, Morris. 2020. “Ericsson, Huawei & Nokia’s 5G ‘wins’ are no big deal.” News Editor. February

24. <https://www.lightreading.com/5g/ericsson-huawei-and-nokias-5g-wins-are-no-big-deal/a/d-id/757677>.

Malnick, Edward. 2020. “Exclusive: Huawei faces 5G ban in Britain within months: Boris Johnson expected to order about-turn with GCHQ set to raise new security fears over Chinese technology.” Telegraph. July

4. <https://www.telegraph.co.uk/politics/2020/07/04/huawei-faces-5g-ban-within-months/>.

McCabe, David . 2020. “The F.C.C. decision is part of a continuing campaign against Chinese firms that make telecommunications gea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Mingas, Melanie. 2020. “Global telecom equipment market up 2% in 2019.” <https://www.capacitymedia.com/articles/3825153/global-telecom-equipment-market-up-2-in-2019>

Morra, James. 2019. “5G Could Restart Growth in Smartphone Market by 2020.”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technologies/embedded-revolution/article/21808533/5g-could-restart-growth-in-smartphone-market-by-2020>.

Pham, Sherisse. 2020. “How much trouble is Huawei in?” CNN Business.

July 4.

Pompeo, Michael. 2019. “The 5G Future: Incredible Promise, Significant Risk.” December 2. <https://2017-2021.state.gov/5g-security/index.htm>.

Pompeo, Michael. 2020.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At a Press Availability.” April 2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at-a-press-availability-4/>.

Richter, Felix. 2020. “The Size of Apple’ s China Business.” February 18.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3246/apple-china-revenue/>.

Sacks, David. 2021. “China’ s Huawei Is Winning the 5G Race. Here’ 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To Respond.” March 29. <https://www.cfr.org/blog/china-huawei-5g>.

Sanger, David E. and David McCabe. 2020. “Huawei Is Winning the Argument in Europe, as the U.S. Fumbles to Develop Alternativ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Sanger, David E. and David McCabe. 2021. “Biden Expands Trump-Era Ban on Investment in Chinese Firms Linked to Militar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

Satake, Minoru. 2020. “China Mobile promotes its 5G services at the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last October. China has invested huge amounts in 5G infrastructure.” *Nikkei Asian Review*. June 4.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Huawei-crackdown/Nokia-hopes-for->

slice-of-5G-pie-on-Huawei-s-home-turf.

Shed, Sam. 2021. “China’s Huawei tries to blame global chip shortage on U.S. sanctions.” CNBC. April

12. <https://www.cnbc.com/2021/04/12/huawei-blames-global-chip-shortage-on-us-sanctions.html>.

“Smartphone vendor market share in China 2014-20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30749/china-smartphone-shipments-vendor-market-share/>.

“Smartphones Market -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20-2025).” <https://www.mordorintelligence.com/industry-reports/smartphones-market>.

“US and Japan to invest \$4.5bn in next-gen 6G race with China.” 2021. Nikkei Asian Review. April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5G Clean Networks.” <https://www.state.gov/5g-clean-networks/>.

Vendor Data Overview. 2020. “Smartphone Market Share.” June 22. <https://www.idc.com/promo/smartphone-market-share/vendor>.

Vincent, Brandi. 2021. “Biden’s R&D Budget Proposals Look to the Future Not the Now, Experts Say.” June 4. <https://www.nextgov.com/emerging-tech/2021/06/bidens-rd-budget-proposals-look-future-not-now-experts-say/174518/>.

Whalen, Jeanne. 2020. “U.S. tries to narrow loophole that allowed

China' s Huawei to skirt export ban.” Washington Post. May 16.

“Xiaomi Posts Profit Jump After Taking Huawei' s Market Share.”

2021. Bloomberg News. March

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3-24/xiaomi-reports-profit-jump-after-grabbing-huawei-s-market-share>.

Xie, John. 2020. “Huawei Says ‘Survival’ at Stake After New US Sanctions.” VOA. May 22.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huawei-says-survival-stake-after-new-us-sanctions>.

Zhihang, Du and Matthew Walshi. 2021. “US shifts from ‘decoupling’ to ‘small yard, high fence’ on China.” Nikkei Asia. February 21.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aixin/US-shifts-from-decoupling-to-small-yard-high-fence-on-China>.

“5G Smartphone Market Size, Share & Trends Analysis Report.” 2020. May.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industry-analysis/5g-smartphone-market>.

作者介绍：李承柱（音）_ EIA 贸易技术变换中心所长。中央大学政治国际学科 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课题为国际政治经济，通商领域的国际政治，全球数字治理等。主要著作及编著，《网络空间的国际政治经济》（李承柱编）“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the Politics of Mega FTAs in East Asia,” 《Northeast Asia: Ripe for Integration?》（共编），《Trade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Role of Ideas, Interest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共编）等。

第三章 中美竞争2050:尖端技术领域

半导体

裴英子 (音) (배영자) (建国大学)

一、前言

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尖端技术领域展开，其核心在半导体。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维持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政策，并于2021年2月底签署了对半导体等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行政命令。同年4月，美国将中国运营超级计算机的公司和7家给这个公司提供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列入限制出口的“实体清单”。这也预示着中美将进入长期的半导体供应链之争。半导体是5G、云盘、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生物健康、人工智能等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零部件，确保半导体供需稳定是决定第四次工业革命胜负的重要因素。同时半导体作为决定各种尖端武器性能的主要部件，是极具代表性的军民两用(dual use)技术。半导体技术因其商业需求，一直以来都以民营为主导，政府作为购买者通过投资及各种政策支援，在半导体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Weiss 2014)。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半导体产业的发展(Morris 1990, Brown and Linden 2016)，中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后，通过大规模投资加速了半导体技术创新，向美国发起了挑战。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通过征收关税、限制交易、限制海外投资等方式，牵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美国在阻止中国半导体崛起的同时，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半导体价值链，这意味着半导体行业在科技发展中的转型会受到各国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半导体产业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美国企业为维持技术优势摸索着多种解决方案。本文围绕中美在未来半导体领域中的竞争，整理归纳了一些有关两国竞争资料，以便分析和判断中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趋势。

二、中美半导体领域争端

(一) 美国限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创新

2015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始崛起，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实施了一定的限制。同年，中国半导体国有企业紫光集团欲收购全球第三大芯片巨头美光，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以紫光生产中国尖端武器芯片为由阻止其并购。2017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称PCAST)发表了题为《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报告提到，中国半导体崛起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委员会建议政府对美国产业加以限制(PCAST, 2017)。

特朗普执政后，曾以多种途径遏制中国半导体的发展。2017年8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贸易保护法》第301条款启动对中国的调查，判断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或政策是否对美国企业造成歧视。特朗普政府通过多份报告表明，中国公司引导美国公司及资产的系统投资与并购，并从中获得了前沿技术与知识产权，促使技术向中国公司转移。美国认为，这既是对美国尖端产业的威胁，也是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同时也表明中国尖端技术发展与尖端武器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将对美造成军事威胁(military threat)(USTR 2018, White House 2018)。美国认为，中方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技术，已经严重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制定《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等，并向中国展开出

口限制及加征关税等措施。同时，美方试图通过限制中方并购美国企业、知识产权诉讼等多种手段加以阻止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

美国为限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崛起，禁止中方企业及资本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并叫停2015年清华紫光并购美光、2016年华润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中国背景私募基金谷桥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思半导体、湖北鑫炎收购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商Xcerra、2018年华裔新加坡企业博通收购高通等提案。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干预，中资在海外收购项目屡屡受阻。美国依据301条款的调查报告，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主要产业及技术的投资并购，包括《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在内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于2018年8月签署生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进一步扩大了CFIUS的审查范围，并在审查和调查中，加强了停止相关投资交易等权限。此法案试行后，中方对美国尖端企业收购的成功案例也跟着大幅减少。随着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收购美国尖端企业的不断告吹，中方企业在技术创新上也陷入了重重难关。

美国主要采取出口管制来限制中方半导体的发展。2017年12月，美国美光科技公司以中方企业福建晋华及其中国台湾地区合作伙伴联华电子涉嫌窃取该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为由，向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对此，福建晋华也对美光科技侵权行为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请求判令美光停止销售侵犯晋华专利的任何侵权产品。福州中级人民法院禁止美光在中国销售26个DRAM与FLASH产品，包含相关的固态硬盘SSD与记忆卡产品。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8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及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等产品。美国商务部2018年10月发布消息称，福建晋华生产的芯片将对美国军用系统供应商造成威胁，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福建晋出售软件、技术及产品，美科技公司向

晋华出售产品之前，需要事先获得政府许可。随着美国最大半导体设备制作商应用材料公司等禁止向中国出口，福建晋华、合肥长鑫等企业陆续出现问题，最终福建晋华决定停止DRAM开发计划。

2019年，美国商务部前后两次宣布对将华为及其114家海外关联机构限制交易。这也使华为手机受到了两方面限制：一方面是英特尔、高通等公司不能为华提供芯片，新一代智能手机将无法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另一方面是华为海思用于进行芯片设计的软件EDA被停止更新，将使技术开发受到限制。美国在2020年5月份出台了《出口管制条例》进一步扩大了美国技术及软件制成的产品限制供应范围，华为以及相关企业的供应受到更大限制(DOC 2020)。美国发表了更强劲的限制交易措施，即“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未及25%的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进行商务往来时，也必须得到美国许可。”在半导体价值链上，美国掌握着设计软件和设备，不仅中断了对中国的供应，而且像TSMC一样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企业要和中国进行商务往来时，也需要得到美国的许可。美国就是想通过这种“卡脖子”(Chokepoint)的制裁方式阻碍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技术发展速度，加大施压力度。

(二) 中国的应对措施

对于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遏制，中方原则上强调持续对话协商的重要性，同时要完善中国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也在考虑是否采取可以压制美国的措施。例如2019年6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只有谈判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2020年5月，美国针对华为公司再次加强出口管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韩联社2020年5月19日报）。据《环球时报》了解，如果美国实施这一措施，中方将毫不留情地对高通、思科、苹果、波音等美国企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Global Times 2020/05/16)。苹果、高通、波音、思科等这些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经常被中国在对美反制措施中提及。此外中方将把这些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或根据网络安全法加以制裁或进行调查。

2019年，中国三大储存芯片企业，福建晋华、长江储存、合肥长鑫，预计取得重大突破，但由于美国第一轮出口限制，导致中国储存芯片崛起碰壁；第二轮限制，迫使台积电等企业停止对华供应芯片，华为等公司陷入了困境。截至目前，中国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及网络安全相关制度，并强化国家科技力量中应对美国出台的限制政策。中国一直致力于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1-2017年，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从34.6亿美元飙升至72亿美元。

面对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国以存储器、代加工、晶圆代工为中心，不断在半导体领域进行技术创新与投资。美国的步步紧逼，导致中国储存芯片以及代工产品面临挑战，但这反而增加了中国政府在半导体领域中的发展决心。2018年4月，习近平在考察紫光旗下的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时表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些重大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攻坚克难。目前，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不断制裁，导致中国无法获得未掌握的半导体核心技术，只能自主创新托起“中国芯”。面对制裁，中国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采取设定长期目标、完善制度、调整产业政策、加强技术创新等战略来应对挑战。

中国于2014年设立政府系半导体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完成了2403亿美元的投资；2019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成立，从2020年开始进行投资。

2020年两会出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推进5G、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半导体为基础，对半导体部门的投资也将持续增加。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投资技术改革与人才挖角，政府与民营企业对半导体的投资非常活跃，甚至到了让人担忧的程度。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制裁，或制约着中国半导体的崛起。考虑到中国占据全球半导体行业近一半市场，中国没有理由放弃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创新，中国的半导体将会持续崛起。

三、中美半导体矛盾展望

（一）拜登政府对华半导体政策

2021年伊始，拜登政府就任后将对中国尖端科技采取何种管制措施备受关注。在此情况下，拜登于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100天内完成对半导体、电池、稀土和生物医药等4个行业领域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此外，还要求在一年时间里完成对国防、公共卫生、信息通讯、能源、交通、农产等部门的供应链风险评估。供应链风险评估旨在掌握核心材料的调配能力、制造能力和供应链风险因素及其恢复能力(Resilience)等。从美国政府近期采取的措施和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报告中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对华半导体管制措施能够衡量其技术政策将朝着何种方向制定。下面将解读半导体近期措施和相关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第一，《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为美国生产半导体创造有利激励”（CHIPS for America）的条款引发关注。美国议会于2020年提出该《法案》，其核心在于重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基础，并为确保美国竞争力优势进行大规模联邦投资。《法案》将投入300-500亿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基础的扩大，为投资企业提供多种税收抵扣，创建国家半导体研究技术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制定国内产业标准(Domestic Production Requirement)，在国防部的主导下，组织包括民间企业在内的财团将多种内容法制化。

第二，美国人工智能委员会(NSCAI,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于近期发布如下报告。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根据《2018年国防授权法》获批成立的党政组织，由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担任主席，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担任副主席，其任务是负责向总统及国会提供人工智能领域的建议。委员会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左右未来国家安全形势的重要拐点，因此美国必须确保该领域的领先优势，并为此于2021年3月中旬，将相关议题内容和建议编入长达750页的年度最终建议报告。该报告书还指出，人工智能的长足发展取决于半导体技术，为此有必要加强知识产权、出口管制、外国人在美投资限制等。同时建议，到2026年为止，保证每年在人工智能研发上投入320亿美元，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Technology Foundation)、扩大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National AI Research Institutes)的规模及数量。此外，为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共同牵制中国，提议设立多边人工智能研究所(MAIRI, Multilateral AI Research Institute)，并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韩国、英国等国纳入技术同盟(Emerging Technology Coalition)。

第三，拜登政府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多番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另在4月初，美国商务部以中国超级计算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公司和机构纳入禁止出口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其中包括4家国家超级计算、人民解放军旗下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CARDC)提供半导体芯片的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也是拜登政府就任后首次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为飞腾公司代工生产芯片的台积电则宣布立即履行出口管制措施。

第四，4月12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主持召开了半导体产业链CEO视频峰会。英特尔、Alphabet、GM、福特、美光、台积电、三星等企业参加了该会议。期间，总统拜登拿出一张硅片表示，美国没有理由继续等待海外投资半导体，直至21世纪末，美国将持续主导半导体领域”。据悉，此次会议就目前美国“缺芯重灾区”车载半导体供应不足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讨论建立稳定的半导体供应链和增加美国半导体制造部门投资等问题。

(二) 美半导体领域战略目标与手段弊端

综合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报告和美政府对华采取的措施来看，拜登政府试图在半导体领域尽可能地拖延中国崛起的速度，在提升自身半导体供应链稳定性的同时，继续维持与中国技术之差。不仅如此，美国还将极力推迟中国参与到尖端产品代工或存储器领域，并为着力提升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制定多种策略。美国的半导体战略大致可归纳为三点，即公然向中国施压、构建战略同盟、提升美本土制造能力。

第一，美国对华直接施压的主要手段为出口管制。美商务部至始至终都在限制向

中国出口尖端半导体设备和软件，拜登政府更是将为超级计算机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企业列入交易限制名单。此外，NSCAI还在报告中提及，为拉大与中国的差距，除了已经被制裁的极紫外线光刻机外，还应将浸润式ArF光刻机、深紫外（DUV）光刻机等追加到限制出口清单中，至此未来走向备受关注。ArF设备的技术水平虽不如用于5nm半导体生产的EUV设备，但其是制造16nm半导体的主要尖端设备。目前，中芯国际（SMIC）主打是55nm，65nm工艺，并于近期开始生产14nm尖端工艺，且将于今年年底完成12nm的量产计划（韩联社，2021年1月28日报）。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代工厂——台积电和韩国三星已完成对5nm细微工艺的批量生产，而在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中国生产车间里，正在使用ArF设备批量生产三维（3D）积层（V）NAND闪光灯和10nm级DRAM等内存产品。美国扩大对华出口制裁范围的矛头直指中芯国际，这也将延缓中国半导体的崛起速度。

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福建晋华、高硅、SMIC等主要半导体企业遭遇冲击，中国半导体的崛起态势也随之延缓。美国政府对华禁售，致使生产DRAM芯片的福建晋华业务暂时停摆；海思受美国EDA出口管制影响，既无法设计高性能芯片，也无法委托台积电代工；SMIC在高性能半导体制造上所需的装备供给也同样出现差池。目前，就连中国半导体自主研发代表企业——紫光集团也宣布无法清偿债务，可想而知，中国的半导体企业现状可谓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英特尔和高通等美国半导体设计、设备、软件企业在全全球最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出口受阻，导致美企销量减少承担不少损失。诸如苹果等美企在华的生产制造商，均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据悉，Applied Materials、KLA、Lam Research等美国装备企业对华出口比重分别为20%、17%、15%，而对华出口减少导致总体销售额骤减。2021年，高通在智能手机领域半导体的对华出货量同比减少48.1%，同时，

高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2019年的37.9%锐减至2020年的25.4%。这种“逆火效应”，迫使美国将出口限制范围缩小至国家安保领域，引起了“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策略大讨论。同时也有人指出，出口管制策略虽能奏效一时，但若长此以往，企业会深陷疲于应对、成本上涨、亏损累积等窘境，不免让人对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产生疑义。

第二，与特朗普政府牵制中国的手段不同，拜登政府则善于利用双边和多边合作筹码。正如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所强调的，需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建立技术同盟。受邀白宫主导的半导体产业链CEO峰会的除美企以外，还有韩国三星、台积电、荷兰恩智浦等，这表明美国想要建立半导体供应网，就必须与上述企业联手。

当前，美国正在加强半导体领域的双边和多边技术合作。例如，在多方合作机制“四方安全对话”中，主要就气候变化、新冠疫苗、新兴技术等领域紧密合作，并建立“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其中尖端技术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主要议题。与此同时，多双边合作也被提上日程。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首脑会谈后决定开启新的“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关系（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Partnership）”，旨在加强在新技术、经济、防疫、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其中技术领域合作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协作，经济领域发展计划包括通讯技术（ITC）交流和6G移动通信等。韩美首脑会谈后，双方决定以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为抓手，为构筑安全稳定的供应链，建立互补的最佳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半导体、电池、生物等领域，两国应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投资和供应链合作。台积电断供华为的芯片供应商海思半导体，而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台积电更是与美国一道实施制裁，中断与中国CPU设计公司飞腾的合作，表现出与美国密切合作的态势。按照拜登政府要求，台积

电将斥资超120亿美元赴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一条半导体生产线。

美国的半导体同盟关系愈发牢固，而中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半导体制造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却逐渐增加。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正面临材料、装备、高性能半导体芯片等的采购难问题，中国被排除在尖端半导体供应链之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不过，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企业加强与美合作，并不代表他们将立即中断与中国的合作。三星和台积电在投资美国的同时，也在持续对华进行投资。然而，如若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恐将压缩对中美两国共同投资的空间。另外，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中国的技术和生产力虽尚且薄弱，但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与涌动的市场活力，很难让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放弃中国市场，因此，将中国市场排除在外的技术同盟也并非坚不可摧。

就当前半导体供应链中，中国市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美国的半导体同盟需对中美“脱钩”秉持一定程度的了解。美国人工智能委员会（NSCAI）与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的报告认为，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全球价值链中，美国所追求的完全“自给自足”（Self Sufficiency）既不可取，也是不现实。此前，波士顿咨询公司曾在报告中指出，若中美“脱钩”，那么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规模将缩水30%左右。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在报告中表示，若美国不再进口半导体，而是将其全部带回本国生产，恐导致生产成本上涨35%-65%，因此完全“自给自足”并非良策。在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里，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经济模式根深蒂固，过度干预将使中美双方乃至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第三，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加注重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力量，也更乐于项目投资。今年年初，在出台《美国芯片法案》后，《美国代工厂法案》开始商讨半导体制造设备扩增问题，并召开《无尽的边界法案》听证会，讨论增

加基础科研预算和科技人才培养问题。美国白宫和国会一致认为，牵制中国固然重要，但若要维持美国的技术创新优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虽然投资美国半导体产业不会直接影响对华投资，但美国尖端半导体生产力的提升和稳定供给，会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并激励美国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倘若美国从拜登执政后，就开启对基础研究和制造业的常态化投资，其发展前景不可预估。诚然，想要合理分配联邦政府的资金投入，并取得预期效果也并非易事。例如，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在内的企业向白宫和国会提出，如果政府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过多地倾向车载半导体等特定领域，恐制约其他领域的半导体供应，甚至造成市场供给畸形，因此需通过供应链韧性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若想在基础科研和制造业领域收获肉眼可见的成效，则需依靠常态化投资，拜登的四年任期过后，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将成为重要变数。

（三）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目标和战略手段

在美国采用出口管制、建立同盟关系、提高国内制造力量等打压措施时，中国能亮出的筹码寥寥无几。面对此种形势，中国需保证半导体尖端芯片的稳定供应，构建从高附加值产品产出到设备装备升级的半导体价值链，并在赶超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同时，实现高端半导体国产化。当前，半导体已超过原油，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商品。因此，只有实现尖端半导体的国产化，才能使中国跃升为高端制造业大国。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将在2025年实现国产半导体芯片70%的自给率。

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正通过各方渠道获取外国尖端技术和大规模战略投资。特别是在自身技术薄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并购拥有尖端技术的海外半导体企业、转移

外资企业技术、挖角高级别人才等方式，加速了本国半导体技术的创新能力。然而，由于美国对华采取出口管制和同盟战略措施，使得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无法获取海外尖端设备和软件，也无法委托外企生产尖端半导体，致使中国的半导体企业面临技术创新速度迟缓，甚至倒闭的窘境。随着尖端电子产品的产出遇阻，中国跃升为尖端制造强国的目标也渐行渐远。

针对美国的压制，中国准备以更大的“筹码”予以反击。在美国加紧对华出口管制后，中国商务部、科技部于2020年8月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该《目录》中共有53项新技术被指定为出口限制技术，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无人机、3D打印、生物、建筑机械等中国自主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技术领域，成为了此次制裁的重点。

同时，在2020年9月，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Unreliable Entity List）制度。据推测，若中方实行该制度，不但美国企业会受损，与美企合作的中企也将面临亏损，因此该措施很难被执行。

现阶段，半导体的设计、装备和软件等领域的主导权仍掌握在美国手里，而中国几乎无法逃脱制裁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针对美国的制裁，中国非但没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而是设立长期目标，采取了包括制度整顿、调整产业政策、加强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新长征”战略。此前，中国着重在获取外国尖端技术及人才挖角上下功夫，但受制裁影响，今后不得不通过加大对国内的投资来提高半导体技术的创新。2021年3月，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决议。全文共设十九章，包含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教育、国防等多个领域的目标和推进方向，

尤其强调科学技术的自立和自强。第十四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包括了从战略上培育八大产业的内容。八大产业包括稀土等新材料；机器人工程；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农业机械；高铁、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C919大型客机等重大技术装备；尖端医疗装备及新药；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等。同时提出到2035年的中长期目标，将从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脑科学；基因及生物技术；宇宙深海探测；临床医学及医疗保健等7大领域中寻找突破口。

中国一直努力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影响力，但实际上很难将其作为应对美国尖端产业供应链的筹码。取而代之的是，如果在中国国内完成半导体及相关配件，并建立起“红色半导体（RED）”供应结构，那么就能把最尖端零部件和装备国产化，还能扩大内需市场。

四、中美半导体争端中长期展望

到2030年，美国依然能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同时牵制中国，但伴随着中国半导体技术的不断提高，双方在半导体领域的摩擦将日趋常态化。目前，正在推进的韩国及台湾企业在美国国内进行顶尖的代工投资，使得尖端半导体在美国国内的制造变为可能。美国企业确保最尖端半导体的稳定供给，优秀的设计及制造技术取得双优效果，以此为美国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当前，美国向全球提供80%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软件，并拥有英特尔、AMD、高通、英伟达等主要芯片设计公司。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占据的优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对于美国相对脆弱的尖端制造领域，可通

过携手韩国和中国台湾企业的合作及美国本土投资的增加来弥补欠缺，从而构建更加稳定的增长基础。但从美国自身来看，将该理论变为实际情况需要长时间的合作和投资。例如，目前可以制造5纳米芯片设施的台积电和三星公司正在美国国内建厂，正式启动还需要2-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5纳米芯片可能不再是最尖端产品，但美国政府仍然计划为制造尖端半导体设施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援。因此，为达到理想目标，需要持续投资和长线关注。

尽管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地位不可撼动，但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通过大规模投资半导体领域，“双循环”政策落地，扩大国内市场，虽受美国制裁，但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引进海外优秀人才，随着中国积极在中低端半导体芯片上进行技术积累和提高，半导体技术创新能力也在逐渐加强，因此中美之间的半导体技术差距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不仅让中国半导体企业损失惨重，还延缓了中国半导体的崛起速度。中国提出的到2025年实现半导体自给率达70%变得遥不可及，按目前趋势分析，仅能保证自给率达到20%，远远落后于前期目标。在无法获取美方设备、材料和软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企业正积极培育和支持可以生产替代这些软件的国内自主企业，以此来应对目前的状况。以生产计算机闪存设备公司的长江存储为例，即便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武汉封城，但该公司仍然不遗余力地维持芯片的正常生产和出货，并且为了在中国或海外寻找能够分解生产芯片所需的所有材料装备工程，特别是在各个过程中找到能够取代美国有关技术，聘请了800余名专业人员开展工作。以往，因技术水平不足而未受到关注的中国企业正被大量关注和扶持。期间，金士顿、北方华创科技、中微等众多半导体设备企业销售额飞速上涨，备受关注。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的技术水平虽依然薄弱，但其庞大的内需市场将持续带动国内技术

创新。

可以说，中国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激发了中美半导体矛盾。以2040年为起点，中美将在半导体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对决。美国同盟战略以及中国自主研发技术，虽能使两国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上相互依存，但在最尖端半导体供应链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现象。目前，美国正积极通过对华出口限制和战略同盟策略，试图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受制裁影响，中方只能以中外合营为核心，构建半导体供应链。在此情况下，随着中国技术的长期积累，双方预计在半导体尖端领域，朝着巩固和构建各自专门领域发展。由于中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和矛盾愈演愈烈，双方将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方式重组技术产业结构，并构筑新型竞争创新模式。鉴于技术发展的升级加速和新产业的不断涌现，两国围绕半导体的博弈也将继续保持下去，预计两国的技术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就美国而言，经济增长活力远远不及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地位也正面临着中国的挑战。中国借助大数据应用市场，主导人工智能、宇宙开发、能源技术等部门，使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地位逐渐提高。

有人主张，即便中美半导体博弈会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失，中长期来看，半导体生产力下降和成本上升，将使双方走向一个全球性“创新冬季”（Innovation Winter）。虽然短期内中美半导体之争不可避免，但双方要加强对话，不应采取极端竞争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应该承认任何措施都不能完全阻止中国企业的技术革新，而应该将对中国的制裁措施的重点放到非法窃取技术或严重危害国家核心利益上。只有以WTO多边贸易规范以及出口管制等为基础，并且在尊重市场原则的基础下采取这样的措施，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可。同时，美国要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放宽对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出口限制，从长远来看，必须接受一定程度上的人才流失，并且要为加强半

导体产业薄弱部分的竞争力和扩充人力资源提供支援。

就中国而言，必须认识到美国技术和市场是恢复中国经济复苏的核心，并减少挑战和技术上的非法窃取，让美国意识到中国也能成为其最好的合作伙伴。同时，要正面解决长期以来在中国内部存在的知识产权制度缺陷，还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反补贴问题，从而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中国也应该为半导体技术创新的持续投资，从长远角度出发而做出努力。

中美双方要以相互依存、尊重市场规律、遵守多边贸易体制、履行监管制度为中心，互相妥协，共促发展。虽然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两国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要承认，基于两国数十年全球价值链内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关系紧张但两国经济繁荣确是事实。如果任由事态扩大，除两国以外世界经济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双方要有“共同责任”意识，必须以“原则性相互依存(Principled Interdependence)”为基础来解决问题(Kennedy 2020年)。如果一方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应根据国际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进行透明处理。另外，两国在避免不必要对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推动良性竞争，把重点放在自身技术创新上，双方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才能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金秀珍(音).关于中国半导体扶持政策现状及影响力分析.友利金融研究所.2019

[2]裴英子.中美合作与矛盾:以半导体、网络为例.虚拟交流学会会报.2011

[3]裴英子.中美技术霸权竞争:半导体、5G、人工智能领域为中心.亚洲研究院.2019

- [4] 裴英子. 外商投资限制与国家安全: 以美国为例. 国际地域研究. 2020
- [5] 严源浩 (音). 分析中美两国围绕尖端技术领域展开的霸权竞争.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2020
- [6] 尹大均 (音). 博通收购高通被否原因及启示. TechM. 2018
- [7] 李恩英 (音). 中国半导体崛起及未来展望. KDB未来研究所. 2018
- [8] 郑希哲 (音). 全球价值链变化下韩国贸易的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研究院. 2020
-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20.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 Brown, Clair and Greg Linden. 2016. How Crisis Reshape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IT Press.
- Cheng Ting-Fang and Lauly Li. 05/05/2021. US-China tech war: Beijing’s secret chipmaking champions: How Washington’s sanctions boosted China’s semiconductor sector. Nikkei Asia.
- Ernst, Dieter. 2016. “China’s new rol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 Houser, Kimberly. 2020. “The Innovation Winter Is Coming: 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Endangers the World.” San Diego Law Review 57(3).
- Kennedy, Scott. 2020.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Has Lost Its Wei.” CSIS.
- Lewis, James. 2019. “China’s Pursuit of Semiconductor In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CSIS.
- Morris P. R. 1990. A History of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E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eries.

Saif M. Khan and Carrick Flynn. 2020. “Maintaining China’s dependence on democracies for the advanced computer chips.” Brookings

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0. 2020 State of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USTR(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Weiss, Linda. 2014. America Inc.?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erWey, John. 2019. “Chi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s https://www.usitc.gov/journals/jice_home.htm.

White House. 2018.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Office of Trade & Manufacturing Policy Report.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作者介绍：裴英子__建国大学 政治外交学 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外交学院,美

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课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海外投资领域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网络与国际政治，科学技术外交等。主要论文有《国际政治霸权和技术创新：美国半导体技术按例》（2020），《中国网络企业的兴起和网络主权》（2018），《美中霸权竞争和科学技术创新》（2016），《科学技术与公共外交》（2013）等。

第四章 中美竞争2050:价值和规范

价值 规范竞争

金轩俊（音）（김헌준）（高丽大学）

一、美国的攻击战略和中国的预期损失

美国将在价值·规范分歧中使用两种攻击战略。第一种是攻击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第二种是攻击中国的非民主政治体系。本文以这两种战略为中心，了解攻击的目标和具体的施压筹码，推测出中国由此而将遭受的预期损失。

（一）美国的攻击战略：攻击中国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1、目标

美国展开人权攻击的目标有三：第一，从特朗普政府开始一直主张香港人民和新疆维吾尔人民的人权受到中国共产党严重且系统的侵犯，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体制的正当性（Kim2020）；第二，强调天安门事件、镇压人权律师、达赖喇嘛、西藏、刘晓波、反体制流亡者、宗教自由、女性人权、市民社会镇压等传统的人权侵害行为，攻击习近平最近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统性。最近习近平通过开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强调历史教育，凸显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影响，试图确保共产党在历史方面的正当性；第三，给中国贴上“标签”，中国无视国际上对罪犯人权达成的协议，刻画“改革开放之后也不改变的中国”形象。美国突出中国在国内无视规则，在国际上构成威胁的行为，从而攻击中国追求国际领导力的正当性。

2、具体的施压筹码

美国在人权攻势上有三种具体的施压筹码。第一，议会制定中国人权法案，制裁总统行政命令下的个人。美国早在2019年11月就对香港、新疆和西藏完成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Tibet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20)等立法。从2021年香港国安法立法后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来看，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今后可能会追加立法。并且拜登还在维持特朗普政府的香港正常化总统令(The President's Executive Order on Hong Kong Normalization)，根据马格尼茨基法，限制香港、新疆相关高层官员入境，并进行金融制裁。

第二，禁止直接参与中国人权侵害的中国企业进口，并劝告限制美国的跨国企业与其合作。美国早在2019年10月就以新疆的人权镇压和居民监视为由，禁止从世界监控摄像头装备企业大华科技(Dahua Technology)和海康威视(Hikvision)，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等中国企业进口。特朗普此后以任意拘禁、强制劳动、非自愿收集和分析基因信息等为由，禁止了80多家中国企业进口。拜登政府也一直维持这一措施，并在2021年4月以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等为由，扩大到与超级计算相关的中国企业。另外，美国强烈施压，要求美国企业不能协助中国利用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基因分析等尖端技术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近3年来也能看出，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英特尔(Intel)和Nvidia等都成为了施压对象。

第三，拜登政府没有单独批判中国的人权侵害，而是推进了国际合作。最近，美国在攻击香港保安法等中国人权侵害行为时与G7国家联合发表了声明。另外，在美日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了对香港和新疆的“深刻忧虑”，G7外交及发展部长的欧

盟-G7联合声明中也具体谴责了香港和新疆等中国的人权侵害。这很有可能超越指责，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措施。最近有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协议没有取得进展。对新疆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服装等产品禁止进口，并提议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策略。

(二) 美国的攻击战略：对中国非民主体制的攻势

1、目标

美国对非民主体制的攻势有三个目标：第一，将维持独裁、谋求习近平长期执政，在国际上表现出攻击性的中国与长期维持民主主义、对卫生、经济、尖端技术做出贡献的台湾相对比，攻击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正当性；第二，突出中国非民主体制带来的国际性威胁，如最近引发争议的人质外交(hostage diplomacy)，对海外渗透及影响的操作，黑客和网络攻击等(Krejsa 2018; Walt 2021)；第三，强调非民主体制的经济和尖端技术最终将严重侵犯国内人权，并将相似的模式输出海外，将其归结为“数字权威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Polyakova and Meserole 2019)。

2、具体的施压筹码

为达成这一目标，有三种具体的施压筹码：第一，加强与台湾的非正式交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驻帕劳大使于2021年3月访问了台湾，这是台美断交后美国驻外大使首次访问台湾。2021年4月，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问中国，同一时间，美国代表团也以相似的日程访问了台湾。代表团由克里斯·多德(前

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阿米蒂奇(布什政府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奥巴马政府副国务卿)等重要人物组成。美国除外交外,还在准军事、经济领域与台湾加强合作。2021年2月与台湾签署了海洋警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代理部长代理和起到实质性驻美大使作用的驻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出席,表达了双方在准军事领域合作的意志。另外,在尖端技术和经济合作领域,TSMC决定在和拜登进行半导体会谈后,在美国增加工厂,优先供应半导体。美国则努力提高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拜登邀请台湾代表参加就职仪式,这是断交后台湾首次正式参与。2021年5月,美国驻法大使也邀请台湾代表进官邸会晤,同月,欧盟—G7通过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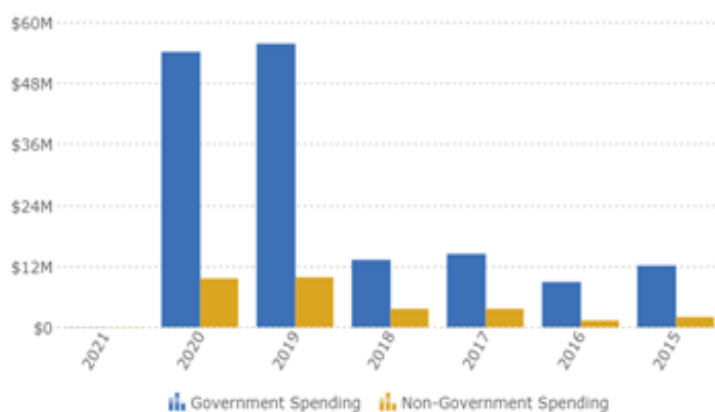
第二,凸出中国共产党体制对国际的威胁。美国最近谴责中国外交的攻击性行为、加拿大、美国、日本国民展开的人质外交、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展开的“战狼外交”、对澳大利亚的报复外交以及中国大使馆传达的“14项不满清单”等(Cheng 2020; Kearsley, Bagshaw and Galloway 2020)。另外,美国揭露了中国在海外的各种非法操作和影响力的活动(Larry and Schell 2018)。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发生的中国渗透及影响、黑客和网络攻击等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还有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视和控制、网上被称为“五毛党”的网络评论集团、“千人计划”拉拢的教授及研究人员,在海外展开的攻击性贿赂战略等(Li 2016; Zelikow, Edelman, Harrison, and Gventer 2020; Zweig and Kang 2020)。

第三,积极反击中国以非民主体制为基础提出的国际战略。最近,中国以秩序的名义美化利用尖端技术进行的压迫和控制。对此,美国在欧盟—G7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构想。此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四国联盟(Quad),美日及韩美首脑会谈谴责并牵制中国的国际战略。美国还揭露了中国

如何威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提出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和外交官，伪装成合法程序压制他们发言。2021年1月，美国发表了“支持人权捍卫者(US Support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阐明了在海外对他们进行保护。

(三) 中国的预期损失

〈图一〉中国媒体国营企业对美国宣传费用增加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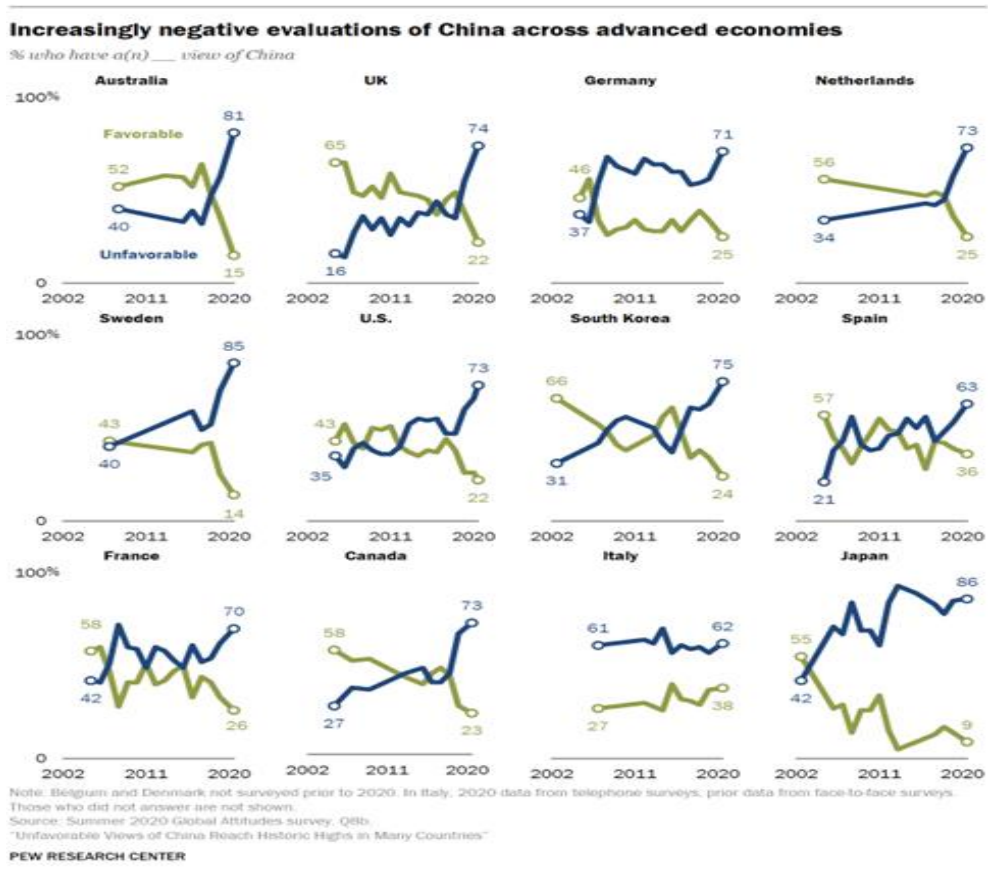


Open Secrets

1、有形损失

第一，中国为应对美国的人权和民主主义攻击，宣传中国的费用增加。目前，多家中国媒体国营企业在美国法务部登记为游说申请，他们在美国所花费用从2019年以后急剧增加（图1）。大部分费用由中国官方媒体CCTV的美国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来支付（（2020年，\$50,244,312））。另外中国2018年为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报道，花费了66亿美元，2019年为宣传中国，在孔子学院等费用上花费了10亿美元(The Economist June 14, 2018; May 24, 2019)。

〈图二〉各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和反感度趋向(2020)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第二，在美国的攻击下，反华情绪激增，而这种倾向将会持续下去。从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反华情绪趋势上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18年以后便迅速恶化（图2）。这和盖洛普等其他舆论调查机构的结果一致。尤其是2019年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荷兰、韩国等国家展现出对中国抱有好感和反感交织的状态。考虑到这种变化，习近平在2021年6月的共产党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宣传中国，主导舆论。

第三，美国通过商务部禁止出口的中国企业的出口额损失和新疆出口限制等使中国企业遭受损失。截至目前，预计损失额约为中国企业总收入的10%(Sanf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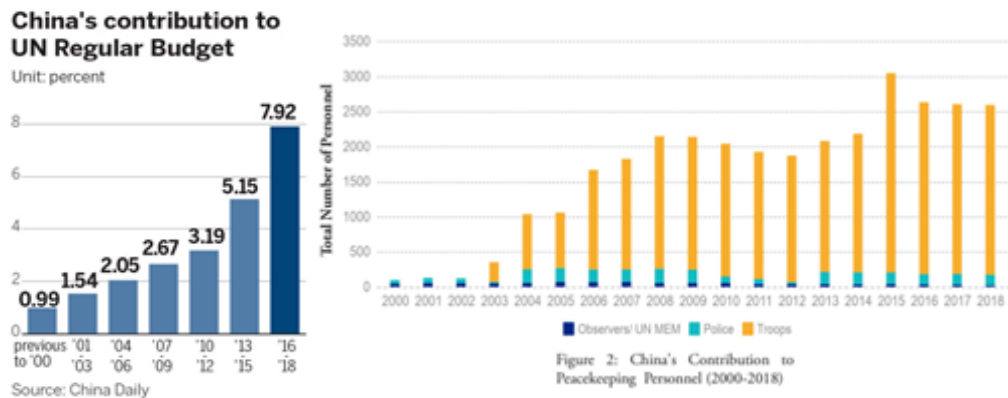
Bernstein 2019)。预计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失败或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损失将会更大。但是由于这两个事例尚未形成，因此其预想费用的推算结果尚不明确。

2、无形损失

第一，美国在积极开展对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权政策时，香港民主人士和国内人权律师及反体制人士的国际流亡将会增加。从天安门事件等以前的事件来看，他们流亡后在流亡国积极展开反体制运动的可能性较大，还有可能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进行反体制活动(Richardson 2020b)。这会让中国极为敏感的国际形象颜面扫地，也会造成无形的致命性损失(Foot 2010)。

第二，应对美国对中国人权和非民主体制的攻击，需要支付拉拢支持国的外交费用。中国在天安门事件后为了恢复形象付出了相当大的外交费用(Foot 2000)。为了恢复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积极参与多边外交，还增加各种摊款。在双边外交中也积极增加了开发援助(ODA)，贷款、投资。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中国增加联合国维和部队(UNPKO)行动的分摊费用和增加派兵(图3)。

<图三>中国的联合国分摊费用和PKO 增加派兵



China Daily,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2018)

第三，美国的攻势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首先，如果代替美国试图在现有国际制度上进行改革的话，其他国家可能会怀疑中国正在追求新的霸权(Lee and Sullivan 2019)。另外，由于新的规范很难形成，中途失败或中国在此过程中反过来被说服或受到压力而遭遇不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Foot and Inboden 2016)。另外，中国在人权和民主主义方面与美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其妥协原则有可能刺激中国国内反体制人士、少数民族、香港等，激活反政府活动，增加体制不稳定程度(Thomas 2001)。

二、中国的攻击战略和美国的预期损失

中国在价值和规范矛盾中将使用两种攻击战略：第一，形成和传播应对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蓝图；第二，利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进行反击。以这两种战略为中心，了解攻击的目标，具体的施压筹码，并计算出该战略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失。

(一)中国的攻击战略：提出替代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蓝图

1、目标

中国制定和传播新国际蓝图的目標主要有三个：第一，以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稳定、防控新冠疫情的成功为基础，提出新的国际秩序蓝图，塑造中国作为国际带头

人的作用和形象；第二，揭露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弊端，攻击拜登政府国际领导力的正当性；第三，美国拉拢同盟和伙伴牵制中国，中国靠经济实力确保支持势力来与之抵抗。

2、具体的施压筹码

为达成目标，美国将使用三种具体的施压手段：第一，开发并积极提出对国际社会的新蓝图(Mazarr, Heath, and Cevallos 2018; Rolland 2020b)。中国自习近平上台后以来一直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基础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对新冠疫情的成功控制、疫苗的成功、防疫物资的有效生产，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解决人类整体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式”。尤其是中国从2021年开始在正式场合强调一股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衰退和中国崛起的“历史潮流”(Yang 2020)。这是以特朗普和新型冠状病毒为契机，获得了部分领导层的确信，把之前以本国国民为对象进行的讨论搬到了国际舞台上。

第二，开发和提出对抗美国积极攻击的人权和民主主义的中国式人权和民主主义蓝图。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1年2月的兰厅论坛上提出了“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提出民主主义不是只有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标准答案。还宣布中国的人民民主反而能实现社会稳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危机，积极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另外，王毅还在同年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人权问题表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people centered human rights)”，强调人权的特殊性，提出在国家所处的状况下应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强调要均衡发展人权的各个领域，并相对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第三，确保支持中国的国家，并在国际政治上加以利用。中国从2017年开始召开会议，提出了反对美国的中国蓝图。2017年12月，中国邀请亚洲、非洲等70多个发展中国家首脑和部长，国际机构负责人、学者，举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新机遇”主题的南南人权(South-South Human Rights Forum)论坛。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通过了包括发展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人权的特殊性等内容的《北京宣言》。以此为基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议并通过了“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Promo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A/HRC/37/L. 36)”的决议。中国在人权领域已确保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越南、津巴布韦等。

(二)中国的攻击战略：利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进行反攻

1、目标

中国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来反攻美国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为了暴露美国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弊端，揭露美国主导秩序的危险性，攻击其国际正当性；第二，揭露提倡人权和民主主义的美国国内发生的各种问题，告知美国的局限性；第三，暴露美国的外交理想与现实背离的问题，诱导美国国内围绕外交问题的政治斗争。

2、具体的施压筹码

为实现目标，中国将使用三种具体的施压方式：第一，揭露美国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去和现在的弊端。中国通过舆论报道和正式声明等多种渠道，不断提醒美国过去试图扩散民主主义和人权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并引发了更多的政治不安和人员伤亡。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要属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叙利亚内战，利比亚空袭、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也门等中东地区利用无人机引发爆炸、海外军事作战中发生的严重的人权侵害；另外，中国还批评美国打着人权和民主主义旗号支持缅甸的民主主义势力，也可能引发地区不稳定。另外，中国认为在巴以危机的状况下，由于美国的反对，使得安理会决议案未能通过，由此谴责了美国的双重性，攻击美国外交的正当性(Wong 2021)。

第二，暴露美国国内发生的人权和民主主义问题，攻击美国的正当性。中国通过出版《美国的人权记录(Human Rights Record of the United States)》，猛烈抨击经济权·社会权侵害、贫困问题、枪击事故、种族问题等美国的人权问题。最近反种族歧视示威(Black Lives Matter)、警察暴力、社会不平等、新冠疫情防控失败、选举舞弊、闯入议事堂暴动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时，中国就此批评美国提出的人权和民主主义连本国内也都没有得以实现。与之相反，中国则宣布在应对新冠疫情，维护社会安全秩序，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了成功(Gill 2020; Rolland 2020a)。针对中国的这种攻击，最近美国出现了美国应该迅速解决国内人权和民主主义问题的呼声(Shattuck and Sikkink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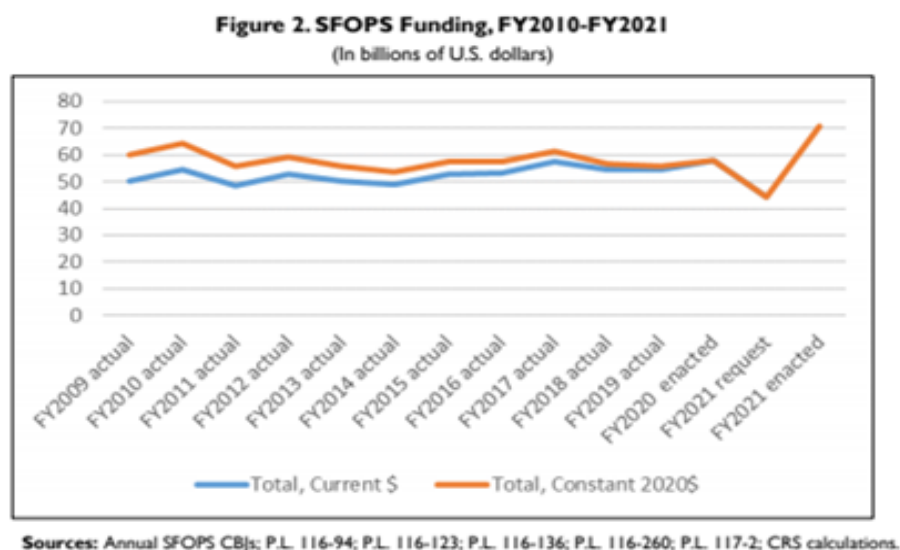
第三，指出美国的外交修辞与国内的人权和民主主义状况的背离以及美国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中国利用各种机会一直敦促美国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消除女性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进而对美国国内发生的诸多问题也加以批评，例如种族档案(ethnic profiling)、推迟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阻止中南美的大

规模非法移民而导致的父母和子女分离收容等。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美国在批判并干涉的他人人权问题，其实美国自身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更体现了美国的双重性。例如中国近期将新疆强制集中营和美国边境集中营，香港示威和反种族歧视示威并置在一起，强调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

(三) 美国的预期损失

1、有形损失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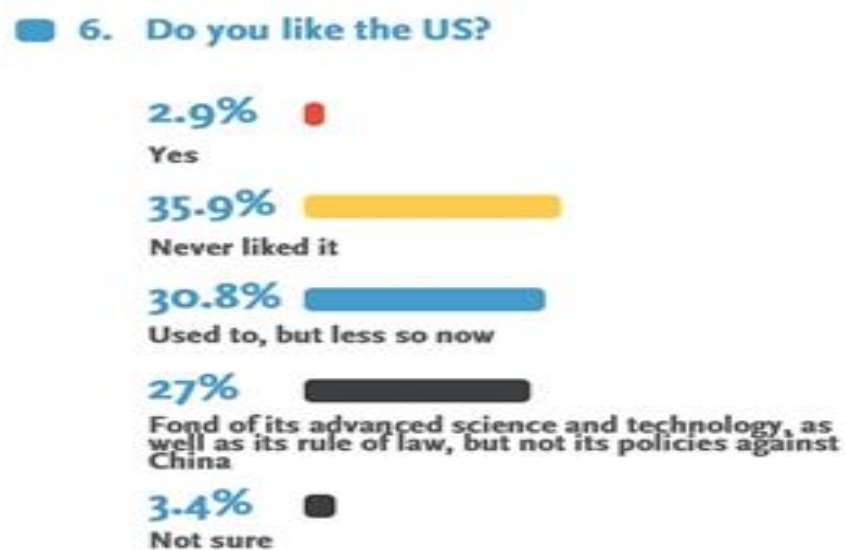
(美国商务部)

第一，为了应对中国的攻击，美国政府的预算增加了。美国也针对中国的对策，从2020年以后增加了公共外交和对外支援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图4)。最近从拜登政府的2022年预算中可以

看出国务院预算为635亿，比2021年增加了12%，这背后有六个要素，其中两个的目的是“提高美国的国际性地位，增进民主主义与人权”，“在难民和人道主义问题上重新确立美国的道德领导力” (Kelly 2021)。这一费用是为了提高美国地位的费用，但如果不是中国的积极攻势，其实也并不需要支付。

第二，中国国民对美国的舆论和看法恶化造成的损失。最近根据《环球时报》的调查，2020年对于美国的反感度高达66.7%。其余的好感度也只有2.9%，对于科学/技术或者法制的评价虽然很高，但对于对华政策表示不满的比率为27%（图5）。这种对美国的反感缩小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范围，限制了可采取的战略措施。

〈图五〉 2020年环球时报的调查



Global Times (2020)

2、无形损失

第一，积极支持台湾的政策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

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主权问题，因此将台湾问题定义为“不可逾越的红线(red line)”。最近据台湾的舆论调查(Taipei Times, February 25, 2021)显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人口比率急剧增加到83.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积极的对台政策有刺激到中国爱国主义或统一论的危险(Mastro 2021)。

第二，如果继续对中国实施现有政策，美国企业就会蒙受经济损失，就会引起拜登所重视的中产阶级的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积极的反华外交政策很有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对新疆出口的棉花、纤维、白糖、西红柿的依存度比较高的可口可乐，耐克等企业，反对新疆政策，并增加了游说费用(Swanson 2019)。另外，关于缅甸制裁政策也在和中国形成对立状态，但是跟缅甸国家油气公司(Myanmar Gas and Oil Enterprise)有合作关系的雪佛龙在积极地展开游说(Vogel and Jakes 2021)。最近，美国商会也代表企业的利益积极表达了对与中国脱钩的担忧。虽然拜登政府至今还维持着外交政策的基调，但企业的损失累积时，政府能否挺住也是未知数。

第三，由于中国的攻势，美国与同盟的利害关系不一致的部分可能会出现裂痕。中国将瞄准美国的双重标准和差别对待的漏洞展开攻势。从价值·规范的特征来看，美国很难实施一贯的政策，中国会借此机会说服东欧、非洲、中东和南美等国家攻击美国领导的正当性。另外，美国可能会因中国展开的人质外交使本国国民陷入危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已经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牺牲品，美国近期也出现过本国公民被中国非法扣留的先例。

三、中美价值·规范竞争的态势和结果

(一) 2030年中短期预期发展方向

截至2021年，中美的价值·规范已经趋向于一场竞争。国际舞台上，今年4月在美国主办的关于地球变暖问题的线上气候峰会上，习近平出席了会议并唯一一次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但这只是个例外。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的10年里，中美价值·规范的矛盾会逐渐激化。这从美国和中国各自出现的新倾向中可以预测到。在价值与规范方面，中美两国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试图。这种试图是在特朗普时期出现的，拜登上台后在现有的矛盾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新的矛盾正在重叠和结合。从这种情形可以推测今后的矛盾将会加剧。

首先，拜登上台后，美国正式对中国建立了价值·规范阵营。如果目前正在拟定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和《中国课题组报告(China Task Force Report)》一出，就会变得很明显。但是美国3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或库尔特·坎贝尔等主要人士的采访和投稿中也可以看出其轮廓。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将价值·规范矛盾与通商、技术、安保等其他领域紧密联系起来。特朗普时期通商便已经和价值·规范连接了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攻击华为(Huawei)和对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实施禁止进口措施。拜登上台后，虽然撤销了特朗普的多项政策，但大众通商政策一直延续了下去。更进一步说，拜登从任期初期开始以供应链(Supply Chain)为名打造了半导体、电池、生物等尖端技术，并建立了价值·规范新联系。台湾的TSMC，韩国的三星，SK的投资和合作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只和共享价值·规范的国家维持尖端技术的供应链。因此，拜登政府的价值·规范已经受到了重视，与其它问题紧密的联系也变得更加重要。

特别是价值·规范在通商和尖端技术上赋予了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正当性，因此

矛盾也会加深。价值·规范与其他领域不同，具有独立性。价值·规范与军事、安全、经济、技术领域相互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即使这些领域的问题解决，也不能代表价值·规范的矛盾会自然化解。最近，美国正倾向于将价值·规范联系起来，建立四国集团、韩美日、欧盟、G7等多种多边及小多边主义的平台来牵制中国。

中国也跟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对美国的攻势中国只是采取了防御的方式。从应对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转变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方式来看，这时的中国选择了消极的防御方式。应对美国攻击，中国只是解释美国的攻击并不属实，并谴责了美国的这种敌对政策。中央外事工作委员杨洁篪在同年8月发表了长篇评论，主张“美国提出的问题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的恶意攻击，是干涉内政的行为”，并阐明中国面对这样的攻击将坚决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进一步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通过沟通和对话建立建设性关系。

但是，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似乎不再回避价值·规范矛盾，而是非常积极地应对。尤其是2021年以后提出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概念与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蓝图相吻合，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打出的价值口号。这明显与防御性战略存在差异，展现出制定中国蓝图、投射中国的姿态。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抗新冠疫情和特朗普反华攻势之后出现的中国反美情绪和爱国主义倾向。目前中国舆论支持并强化共产党领导层的对美政策攻势。在中美安克雷奇对话结束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均对发言和态度表示支持，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已经把台湾问题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并为此采取非常积极的政策。对于美国派遣大使或在美日韩、韩美首脑会谈上提及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警告其不要“玩火”。

(二) 2050年竞争的预想结果

2030年后，预计中美在价值·规范领域将持续发生矛盾，随着通商、尖端技术、安全等方面关系越紧密，矛盾越日趋激烈。当然到了中美在其他领域寻找契合点，谋求合作的时机时，价值·规范的矛盾也会慢慢消失，但从价值·规范的特性来看，矛盾的余波也会持续很久。价值·规范基于舆论和民族主义、文化和文明等感情情绪因素，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并且国内和国际政治上追求的是一贯性，因此价值·规范具有不容易转换为战略计算的特性。不论是美国的防疫失败，还是因特朗普的反华攻势而出现的中国爱国舆论，又或是拜登上台后持续的反华情绪，都充分体现了价值·规范的这种特征。

中美最终可能会在2050年以后达成妥协，但是那种妥协方式并不会对中国有利。目前美国在中美价值·规范的矛盾中可以使用的战略更多，更有效，从中美两国的预期损失来看也是中国更不利。并且作为中国攻势战略的创造新国际蓝图也很难保障其成功，稍有不慎就会被误解为追求霸权(Hart and Johnson 2019)。另外，中国在试图形成新的规范方面失败或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反遭逆境。2006年，中国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下属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展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过程中曾试图强烈贯彻本国的主张，但却以失败告终。这也说明了中国提出的蓝图或价值还没有那么充满吸引力。仅从计算世界30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软实力30强报告来看，2019年中国在30个国家中排名27，与排名第五的美国差距很大。

另外，中国利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展开反击的战略也很难战胜美国。这种反击方式虽然费用低，效率高，但如果美国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运营国际秩序的态势，则很难看到效果。并且这一战略只能指望美国自己出昏招而失败，这

就限制了中国就不能在自己想要的时机和方法加以攻击。如果像2021年上半年一样，缅甸事态和以色列—巴基斯坦事态共存，能够体现美国的双重标准，这可能对中国有利，但这一状况并不是中国能够制造出来的。另外，美国虽然也像这次一样在初期支持以色列，行动缓慢，但面对国内外的批评，如果美国尽快将残局收拾完毕，中国便几乎没有施压的筹码。在对的新冠肺炎疫苗也是如此，中国指出美国限制疫苗出口，价值观和行动不符，但拜登政府迅速表示支持豁免疫苗知识产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提案，并向印度、南美、韩国等国提供疫苗。中国则无法持续对此进行攻势。

另外，在中美价值·规范矛盾中，美国之所以有利，是因为最近欧盟、亚洲盟国也在配合美国的脚步，展现了更积极的态度。从最近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国防·外务“2+2”会谈、美日首脑会谈、韩美首脑会谈，包括欧盟在内的G7外长及开发部长会议来看，G7，欧盟，韩国，日本等传统同盟国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在经济、通商、尖端技术、卫生等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美国除了在价值·规范方面，还在促进供应链、尖端技术、卫生、人权等国际舞台的多种活动在内的同盟和纽带。美国正在试图使用各种多边战略来团结现有的同盟。欧盟—G7共同声明集中了相当庞大的世界经营构想。从这种倾向来看，预计到目前为止一直发展的价值·规范矛盾将不会轻易消除。尤其是如果价值·规范的矛盾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时，将会更加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同盟国在价值·规范的密切程度与中国今后的态度有关。最近，中国外交如实地暴露了价值·规范的脆弱性。中国利用疫苗和防疫物资的外交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对于与台湾建交的巴拉圭等南美国家，中国利用疫苗供应进行断交施压，这无疑暴露出中国外交轻薄的一面。另外，虽然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

国，掌握着多边主义、非洲开发、巴勒斯坦等议题，但在缅甸事态中展现出的中国对
人权和民主主义的落后认识让民主主义国家感到了失望。如果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在这
一领域没有变化，预计中国和美国推进的民主主义阵营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Cheng, Dean. 2020. “Challenging China’ s “Wolf Warrior” Diplomat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6).

Diamond, Larry and Orville Schell. 2018. “China’ 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The Hoover Institution.

Feltman, Jeffrey. 2020a. “China’ s Expanding Influen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ac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oot, Rosemary and Rana Siu Inboden. 2016. “China’ s Influence on Asian
State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2005-2007.”

Evelyn Goh, ed. *Rising China’ s Influence in Developing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7-256.

Foot, Rosemary. 2000. *Rights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ot, Rosemary. 2010. “Human Rights and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un Breslin, ed. *Handbook of China’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76-84.

Gill, Bates. 2020. “China’ s Global Influence: Post-COVID Prospect for Soft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 No. 2. 97-115.

Hart, Melanie and Blaine Johnson. 2019. “Mapping China’ s Global Governance Ambitions: Democracies Still Have Leverage to Shape Beijing’ s Reform Agend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February 2019).

Huang, Yanzhong. 2021. “Vaccine Diplomacy Is Paying Off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March 11).

Kearsley, Jonathan, Eryk Bagshaw and Anthony Galloway. 2020. “ ‘If you make China the enemy, China will be the enemy’ : Beijing’ s Fresh Threat to Australi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8).

Kelly, Laura. 2021, “Biden Proposes 12 per cent Increase for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 Hill* (April 9).

Kim, Hun Joon. 2020. “The Prospects of Human Rights in US-China Relations: A Constructivist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20. No. 1. 91-118.

Krejsa, Harry. 2018. “Under Pressure: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Lee, Kristine and Alexander Sullivan. 2019. “People’ s Republ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9).

Li, Jing. 2016. “Revealed: The Digital Army Mak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ocial Media Posts Singing Prai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9).

Mastro, Oriana Skylar. 2021. “The Taiwan Temptation: Why Beijing Might Resort to Forc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1).

Mazarr, Michael J., Timothy R. Heath, Astrid Stuth Cevallos. 2018.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Mozur, Paul and Don Clark. 2021.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Sucks Up Data. U.S. Tech Is Key to Sorting I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Polyakova, Alina and Chris Meserole. 2019. “Exporting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Model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chardson, Sophie. 2020.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Syste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chardson, Sophie. 2020b. “Biden Must Stand Up to China on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States Too Often Finds Reasons Not to Ac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7).

Rolland, Nadege. 2020a. “China’s Pandemic Power Play.”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No. 3. 25–38.

Rolland, Nadege. 2020b. “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Practice.” NBR Special Report #87 (August 2020).

Shattuck, John and Kathryn Sikkink. 2021.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Global Human Rights Leadership Begins at Hom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Swanson, Anna. 2019. “Nike and Coca-Cola Lobby Against Xinjiang Forced Labor Bil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Thomas, Daniel C. 2001. *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gel, Kenneth P. and Lara Jakes. 2021. “Chevron Lobbies to Head Off New Sanctions on Myanma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Walt, Stephen. 2021. “Why ‘Hostage Diplomacy’ Work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7).

Wong, Catherine. 2021. “China Accuses US of Being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 of Palestini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y 14).

Yang, Jiechi. 2020. “Respect History, Look to the Future, and Firmly Safeguard and Stabilize China-US Relations: Full text of Yang Jiechi’s Signed Article on China-US relations.” (August 7, 2020).

Zelikow, Philip, Eric Edelman, Kristofer Harrison, and Celeste Ward Gventer. 2020. “The Rise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How States Weaponize Graf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Zweig, David and Siqin Kang. 2020. “America Challenges China’s National Talent Programs.” *Center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作者介绍：金轩俊（音）__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院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外交学院，明尼苏达大学 twin cities 分校 政治学 博士。历任圣奥拉夫大学（St. Olaf College）特聘助理教授、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副教授。主要研究课题，国际规范及制度，国际人权及伦理。著书及编著为《和平转移的国际政治》（2015，共著）The Massacres at Mt Halla: Sixty Years of Truth-Seeking in South Kore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Asia Pacif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等。

第五章 中美竞争2050:价值和规范

政治体制和理念竞争

李东律（音）(이동률) (EAI, 同德女子大学)

一、美国对中国价值和理念攻势的演变

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对立从贸易领域开始，扩大到价值、理念以及体制领域，演变为最糟糕的局面。在价值和理念方面攻击中国的并非只有特朗普政府，美国一直以来用价值和理念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压制，但这并不是一贯的政治基调。不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中美建交后，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都尝试对中国所谓的和平演变之下的经济进行制裁和封锁。这之后美国在一直提出中国的人权、新疆、西藏等问题的同时，每年都让中国能够连续延长最惠国待遇。但是在人权等话题上，美国的经济制裁并不是一贯和持续的，它是随着两国的关系而流动变化的。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攻势和压制与以往不同。首先美国攻势的范围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政府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国家团结、体制稳定和合理性方面软肋的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施加了高强度全面性的压力。例如，美国议会接连通过了《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2020年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案》等制裁法案，向中国施压。随后议会通过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等对侵害香港自治的外国人和法人，以及与他们交易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法案。特朗普总统还发布了“13936号行政命令”，以应对香港国安法的制定，终止香港优惠待遇。

从习近平和共产党体制等中国的立场上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攻势其实已经越过了红线。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习近平主席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徒”，敦促美国的盟国和中国人民与美国合作，改变共产党，更换政权。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是在中国国力已紧随美国之后的情况下进行了全面的对华攻势，暗示了这场攻势很有可能扩张到势力竞争的领域。

二、拜登政府，以人权、民主价值和国际规范为中心的对华攻势

有很多征兆显示拜登政府将持续对中国的价值和理念发起攻势。拜登政府提出了加强价值基础外交的原则，并在上任第一年就明确表达了将举办世界各国首脑参加的“民主主义峰会”的意向。拜登政府实际是在暗示将主导包括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互助，从而持续对习近平的威权主义体制施加压力。中美高层安克雷奇会晤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罕见地从会议刚开始就提到了新疆、香港、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国务院4月发布了鼓励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湾官员相互交流的新方针，直接刺激了主张台湾问题属于内政的中国。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全面覆盖性的施压攻势，拜登政府会将前任政府的做法延续到哪种程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看，拜登政府应该不会像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中国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体制方面进行全面覆盖性的攻势。拜登政府从根本上明显认为中国是民主主义价值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会在这些领域的相关事件上持续对中国展开更明确更具体的攻势和压制。

事实上拜登政府一直集中提出中国对于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及宗教镇压方面的问题，通过经济制裁向中国施压。2021年1月，美国政府声称新疆产棉花和番茄等产品是维吾尔族劳工在强迫劳动下生产的，并全面禁止进口。而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近12万亿元的国产棉花，由此可见，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打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还施压道，美国正在考虑对存在强迫劳动嫌疑的新疆地区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可再生能源零配件实施制裁。

3月，继欧盟制裁了参与对维吾尔族人权镇压的新疆公安高官后，美国也参与起来。并且，美国国务院4月时发布了《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压制

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新疆开设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是“露天监狱”，试图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另外，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将曾参与镇压“法轮功”的四川省成都市前任高官余辉及其家属定为禁止入境对象。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以“法轮功”事件为依据对中国进行制裁。

特别是拜登政府发布了针对中国主要技术相关企业进行制裁的行政命令。制裁对象包含的59家企业中有通信设备企业华为、CCTV制造企业杭州海康威视、中国三大运营商和歼-20隐身战斗机的制造企业中航工业和国营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国营核能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等基础产业和尖端技术产业领域。拜登政府全面提出人权和民主主义价值，有意构建阻止中国尖端技术领域发展的国际联盟。

总之，拜登政府没有延续前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体制和共产党展开的直接的猛烈攻势。不过集中指出中国的非民主性、人权镇压等问题并实行制裁，间接使中国体制的脆弱性逐渐暴露出来。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此举与共享人权和民主价值的民主主义阵营的国家联手，间接将中国内部和国际社会的反华行动扩散开来。同时美国希望借此遏制中国的发展，放慢中国追击美国的脚步。

三、美国对华价值和理念攻势的得失

拜登政府目前主要集中指出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并借此继续对中国展开攻势。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通过选择和集中方式的对华攻势，在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导权并占据优势，而这种优势会基本持续下去。同时，以人权问题为媒介，在恢复与欧

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阵营的纽带方面也取得了成果。也就是说，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价值和规范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投入的费用较小，更适宜压制中国。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今后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首先，虽然打着人权和民主的价值旗号继续对中国展开攻势，但这种攻势的目的何在，以及这种目的能否实现还存在争议。美国想通过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看到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变化或者人权问题的基本改善，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虽然中国对此强烈反对，称这是侵害核心利益的行为，但对于这些地区和问题方面已经在国内具有了控制力和忍耐性。虽然这些问题可能会损害国家形象，成为通过国际合作而崛起的障碍，但短期之内促使中国发生价值和体制的变化并不容易。相反，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压迫会被视为“干涉内政”，激起在中国国内高涨的爱国主义影响下对共产党体制的支持和内部团结。

总而言之，美国只有长期运用价值和理念持续对共产党体制进行压迫才能取得一定成果，但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费用。短期内不但不会取得预期成果，和中国的矛盾和对立也会因找不到出口而陷入恶性循环的两难境地。尤其是美国为了达到对中国施压的效果，需要建立并维持反中国的国际联盟。为此美国需要长期投入比冷战时期更多的资源和费用。例如，虽然美国采取了禁止进口新疆棉花的措施，但盟国日本的无印良品和优衣库依然在使用新疆的棉花，显示出对中国制裁的联合的不顺利的可能性。另外，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今后在经济实力方面有着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因此在动员经济资源以扩张势力的竞争中，美国很难持续确保优势。

与历届的美国民主党政权一样，拜登政府在政权初期面临的也是“打击中国”的政治效果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尤其是拜登政府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而长期持续对中国价值攻势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效果，因此很难投入资源和费用于此。虽然美国在通过价值和规范向中国施压时占据优势，但为了将实际效果达到最

大化，能否长期持续高强度施压是一道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随着价值和规范领域的矛盾转变为贸易、技术、金融领域乃至军事领域的竞争和矛盾，目前的对于人权和民主主义的压制可能会相对减弱。

四、中国的对策和预想损失

中国认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攻势将持续下去，其目的在于阻止或拖延中国提高国力以及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而减少对美国的威胁。同时也担忧拜登政府通过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一直压迫中国，破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牵引盟国，建立反华国际联盟。

对于在强化一人中心的权威主义体制毅然做出新尝试的习近平政府来说，在美国对于共产党体制的攻势方面反击的手段不多，但妥协的空间也不大。尤其是在即将决定习近平体制能否长期执政的2022年第二十次党代会这一重要的政治日程到来之际，在提高体制稳定性和正当性的敏感性的同时，会降低应对外部攻势的灵活性。因此中国担心拜登政府通过人权或民主发动攻势的火花会扩张到习近平和共产党体制，并对此保持警惕。

中国预测拜登政府基本会以科学技术、国际规范、价值、安全、金融5个领域为中心加强美国的攻势和竞争。即便如此，中国仍然主张拜登政府至少不应重蹈特朗普政府错误政策的覆辙，那就是对中国体制的攻势。在中国看来，由于共产党体制本身存在软肋，因此有人顾虑到越是应对这种问题，越可能让这种弱点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不同于金融、尖端技术、贸易等经济领域，中国在体制和价值攻势面前可以应对

的手段并不多，而且很难在短期内确保优势。

如果对人权问题等价值攻势不扩大到直接压迫体制的话，中国可能不会遭受致命的损失。首先中国在人权方面在香港、新疆、西藏进行镇压这一热点问题在国际社会上传播给习近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巨大伤害，从而耽误了“一带一路”等国际多边合作，长此以往会阻碍中国确保在世界上的领头地位。并且内部的政治负担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也会使得体制管理控制的成本增加。

虽然中国把香港、新疆问题纳入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利益范畴，并敏感应对这些问题，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现在已不是主权和安全脆弱的国家。能对这些核心利益产生直接并致命打击的国家也只有美国，但实际上单靠美国一己之力是很难威胁到共产党体制的。中国对于美国所主导的对华体制攻势以及美国扩大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方面表示担忧和警惕。

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政府对于拜登政府所指的人权问题等价值攻势大体上从三个方面来寻求应对，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的成本负担和损失。第一，面对美国的攻势，坚持在对立状态下不屈服于美国，人权对人权，制裁对制裁，采取强有力的先发制人的态度，以免美国的攻势扩大到体制方面。

例如，中国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3月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2019年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发布后，2021年3月3日又发布了《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⁵中国通过2020年的报告指出了美国国内存在的枪支暴力、贫富差距、高昂的医疗费用、种族歧视、女性及儿童人权问题。中国还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报告》是以自己对人权的狭隘理解为基础，对不利于自身战略利益的国家

⁵ “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网（2020年03月13日）。

的人权状况进行肆意歪曲。4月中国外交部列举了“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予以反击。指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输出动乱、干涉行为、双重标准等五种美国人权问题，并劝告美国在对其他国家采取攻势之前先正视并改善本国的人权问题，谴责美国把人权当做本国行使霸权的手段。

中国对于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制裁。美国和欧盟、英国、加拿大以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为由发表制裁措施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以侵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散布虚假信息为由，宣布对5名欧盟议会议员和荷兰、比利时、立陶宛国会议员等10名个人及4家机关实施制裁。并且发布了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伯金斯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禁止与中国人民和机构进行交易，并且冻结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资产等措施。

但是，中国采取的对应制裁攻势也使中国面临巨大的损失。表示直到中国解除对欧洲官员施加的报复性制裁之前冻结中欧投资协定。事实上中国花了近7年的时间才与欧盟成功地签订了投资协定，这项巨大的外交成果在美国攻势的衬托下让中国更感到非常满足。因此中国对于欧盟意想不到的反击措手不及。

第二，习近平政府在美国的攻势下更加注重内部管制和体制集中。中国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在于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也就暗示着共产党执政的稳定非常重要，为此将优先加强内部团结和力量。

对于习近平政府来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事实上也是衡量实现“中国梦”蓝图的中期评价的重要时期，也是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第二十次共产党大会召开之前，需要最终协调习近平主席能否连任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在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日程时，中国一直表现出试图消除外部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的倾向。因此，中国希望尽量将与美国的矛盾和对立战线最小化，同时为了确保体制的正当性和稳定性

集中管制内部体制。

中国把美国的人权攻势定为阻止中国崛起的单方面，毫无根据的“打击中国”和“干涉内政”，并以此来刺激人民的爱国心，谋求内部团结，致力于恢复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损的对共产党的支持。例如，习近平主席经常强调为了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各民族，团结中国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9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强调：“要在新疆地区凝聚民心，巩固中华民族共同意识，通过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继2019年国家安全法制定后2021年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表示出在与台湾、香港和新疆地区有关的主权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的强烈意志。这是为了通过所谓的“爱国人士”掌握立法机关、准备法律和制度，实际上是想通过改编法律和制度来加强香港融入中国⁶。虽然两会在性质上是讲解国内政治信息，但也蕴含着向美国传达中国领导层的强硬意志。

另外，中国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本国的民意调查结果，并批评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于自新冠肺炎疫情后发达国家加深对中国负面认识的调查是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企图突出中国弱点而歪曲出来的。据全球时报调查显示，有78%的人认为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见图1）。与此同时，在双边关系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要属美国（47.5%）和俄罗斯（33.8%），而欧盟（27.7%）紧随其后。另外，65.6%的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持“批评”意见，而与此相反，对美国职业篮球等美国体育联赛持“批评”看法的人只占11.6%，中国以此为依据，表达了虽然中国反对美国霸

⁶ “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 人民网（2021年03月06日）

权，但并不对美国人持否定态度的信息。⁷这也表示出习近平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正在形成的中国的负面国际舆论。也就是说政府正在警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舆论给国内带来的影响，以防对共产党体制的信任度降低，因此以粗暴的方式进行反驳。但另一方面也警惕着中国人民表现出对美国的反美情绪。

中国国内以网民为中心，对镇压新疆人权提出批评的H&M，耐克，New Balance，匡威等国际企业展开了抵制运动。正在为体育用品品牌耐克做宣传的中国明星们宣布中断代言活动，瑞典国际SPA品牌 H&M甚至面临退出中国市场的危机。

中国在内部弘扬爱国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还通过深化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控制社交媒体等加强内部体制管制。中国在2020年2月在北京大规模举办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历史，以及合法性。习近平政府正在推进的内部控制和思想教育将持续到2022年底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共产党委员代表大会。中国将对香港、新疆等存在内部不稳定和动摇迹象的地区加强内部治安和管制，从而承担追加费用。在应对香港示威的过程中加大和控制对公共权力的投入，使得经济、社会费用有所增加。

但是共产党宁愿将美国的压制反过来用于集结和稳定体制来迂回对应党内体制的危机管理，也不愿让其成为维持体制的必要充分条件。由于习近平政府必须要克服新冠疫情的危机、美国的压制、国际社会的负面认识和警惕、确保新增长动力等困难，做出能够达到中国人民高度期盼的成果，尤其是取得“美好生活”的实际改善成果，用于经济恢复方面的费用负担会大幅增加。

第三, 中国面对美国攻势，对外扩大友好国家的外延，在遏制反华国际联盟形成的外交方面采取迂回应对措施。中国与美国不同，在没有同盟国的情况下，除了利用

⁷ 环球时报称，11日至17日在北京上海等16个主要城市，对1946名18岁至69岁的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报告。

经济合作和支援，能确保援军的手段并不多。例如通过利用已构建的“一带一路”网络的经济援助，试图遏制其他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反华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与起初中国打算将“一带一路”发展成中国新的增长动力的目的不同，“一带一路”反而起到消耗中国经济实力的反作用。

习近平政府对于那些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攻势的国家进行了经济制裁。例如，断然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实行经济制裁，针对台湾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训练等进行施压。结果也使中国遭受了经济、对外形象恶化等无形损失。

中国强调2021年七大外交课题之一是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为延续此课题，习近平主席在6月1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中要求加强在国际上宣传中国形象和国力的工作。习近平主席表示：“在新形势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非常重要”，并且“要营造符合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有利于改革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⁸[习近平政府早在2018年就統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人民广播电台（CNR）、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等主要官方媒体，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掌管的官方媒体，寻求营造国际舆论。在此次集体学习中，他再次强调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明、中国的发展观、多边主义、公正的国际秩序等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将做好长期和美国进行价值及规范竞争的准备。

尤其是中国将以中南美、非洲、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积极宣传中国体制和价值，展开增进理解的公共外交。为确保中国体制的正当性，公共外交将面临不小的支出负担。实际上，中国外交相关支出自2003年以后每年都在持续增加。特别是

⁸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共产党员网】（2021年06月01日）

习近平在第一届任期末的2017(\$8 bn)支出比胡锦涛任期末的2012(\$5.2 bn)增加了2/3。(见图)⁹而2018年再次增加了15%，达到了\$9.5bn。¹⁰

尽管如此，以2017年为基准，中国整体政府支出中外交支出所占的比重(0.26%)并不大。中国政府支出中占据比重较高的依次为社会安全和就业支出(23.7%)、公共卫生(23.3%)、教育(18.1%)，暗示着外交领域并不处于政策的优先地位。也可以说，中国在今后的外交支出上还有一些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习近平政府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2021)、制造2025、健康2030、军队现代化、环境污染、教育改革等方面要求支出巨额资金，持续增加外交支出可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特别是优先投入稳定体制构建社会安全网方面的支出。

五、预测

(一)2030年

在中美关系短时间内陷入最为困难的局面的过程中，势力竞争这一结构性原因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短期内，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对于两国间的势力竞争这一基本趋势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中美两

⁹ Markus Herrmann and Sabine Mokry, China Races to Catch Up on Foreign Affairs Spending, "The Diplomat." (August 09, 2018).

¹⁰ Charles Clover and Sherry Fei Ju, "China's diplomacy budget doubles under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MARCH 6 2018)

国激烈的竞争和对立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但另一方面，两国都因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持续着风险较大的直接冲突和对立格局，因此国内政治倦怠感和排斥，还有经济负担肯定少不了。因此拜登政府在冲击的敏感性和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可能通过能够展现美国认同感的人权和民主话题持续展开低强度的攻势。拜登政府在国内站稳脚跟前会打着人权的旗号对华展开攻势。

围绕人权和民主等价值和理念的对立及矛盾，只要拜登政府不停止攻势，习近平政府就只能站在守势位置进行应对，很难消除或达成妥协，这种长期的对立局面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这本身并不会成为两国矛盾和竞争的核心领域。首先，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目前推迟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直接攻势，并且没有越过“红线”。如果围绕人权和民主的矛盾和对立没有扩大为体制对立的话，这种矛盾和对立就不会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如果这一领域的对立持续下去的话，虽然两国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难免会发生有形或无形的损失。尤其是与美国相比，中国会遭受更多的损失。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形象、声誉、强化国内社会管制带来的僵化等一些无形损失并不小，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会给中国崛起带来负担而出现差错。

由于围绕价值的对立和矛盾形势正发展为主要通过舆论战和经济手段进行制裁和报复的形势，分歧的战线将与贸易、技术、金融领域等其他领域发生的矛盾相结合，有可能交织在一起持续下去。

(二) 2040年

虽然价值矛盾不会成为导致中美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拜登政府的攻势长期化，两国之间的根本性不信任问题将进一步加深，很有可能成为阻碍两国恢复合

作的主要原因，也可能成为两国间对立慢性化、结构化的因素。并且价值矛盾和对立的长期化与恶化会刺激和激化其他领域形成竞争和对立，使两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例如，随着对人权问题的攻势演变为经济制裁，金融及尖端技术领域的对立和竞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中国的主权利益中的台湾问题会让价值矛盾长期化并加深战略性不信任，军事紧张加剧，不能排除扩大为偶发性冲突的危险。尤其是目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政府具有很强的独立倾向，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也急剧增加。中国也通过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训练予以应对，因此紧张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美两国历代在台湾问题都在警惕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相互牵制的倾向。尽管如此，如果军事对峙和紧张局势升级，就不能排除因突发事件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三) 2050年

在中国崛起计划即将完成的2050年，围绕价值和理念的矛盾局面将可能脱离以往的美国攻势和应对中国对应的模式，转变为两国间激烈的竞争。中国正在制定长期计划，把中华文明的价值作为普遍价值传播到世界，即从长远角度准备中华文明的再普遍化。如果中国的崛起目标如期实现，中国最终要维持共产党体制，并解决确保全球领导力和价值标准的课题。中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与社会主义理念相比，更突出中华文明。总之，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宣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之处的同时展开与美国的价值和文明竞争，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方式来确保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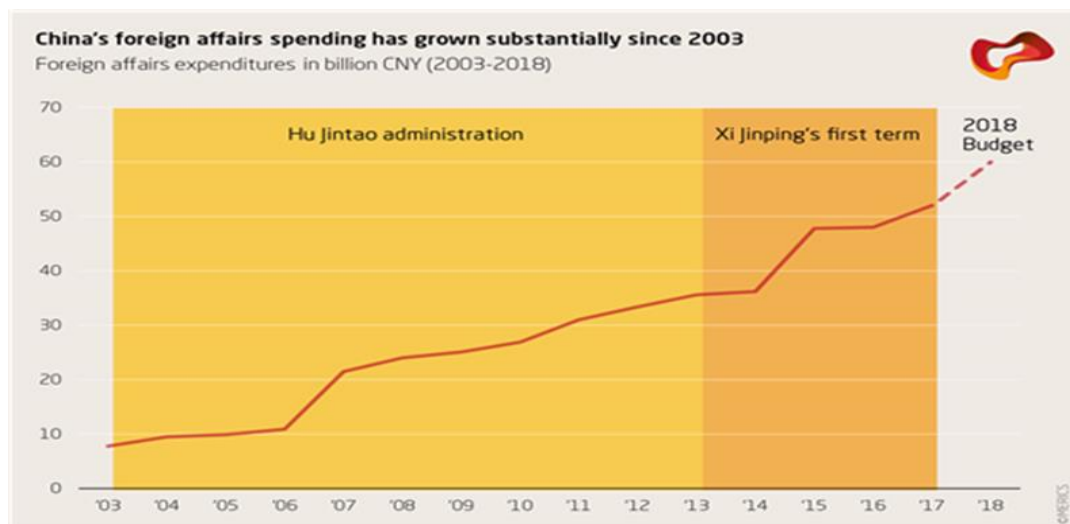
习近平主席已经使用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的修辞手法，暗示了通过文化普及强化体制认同和体制合理的意图。不只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界对中华文明价值的文明论的重新评估也大为活跃。在安克雷奇中美高层会晤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提到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大部分国家并不认同美国价值是国际价值，这一点值得关注。

(图一. 中国国际形象调查)



(图二. 中国外交费用支出趋向)



参考文献

- [1] “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网 (2020年03月13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036024908643874&wfr=spider&for=pc> (日期2021年3月10日);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网 (2021年03月24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100509665933460&wfr=spider&for=pc>
(2021年3月25日).
- [2] “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 人民网 (2021年03月06日).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1npc/n1/2021/0306/c435267-32044082.html> (2021年3月6日)
- [3] 环球时报称, 11日至17日在北京上海等16个主要城市, 对1946名18岁至69岁的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报告。
“Chinese rational on China-US ties: GT poll,” Global Times (2020/12/26)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11038.shtml>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共产党员网』 (2021年06月01日)
<http://www.12371.cn/2021/06/01/ARTI1622531133725536.shtml>
- [5] Markus Herrmann and Sabine Mokry, China Races to Catch Up on Foreign Affairs Spending, “The Diplomat. (August 0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china-races-to-catch-up-on-foreign-affairs-spending/>
- [6] Charles Clover and Sherry Fei Ju, “China’s diplomacy budget doubles under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 (MARCH 6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2c750f94-2123-11e8-a895-1ba1f72c2c11>

作者介绍：李东律（音）_EAI中国研究中心所长，同德女子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博士，现就任现代中国学学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主要研究课题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等。最近研究“中国在韩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进程中的战略和作用”，“1990年代后中国的外交论调的进化和现在的含义”，习近平政府’海洋强国’构想的地缘经济学研究与困境““Deciphering China’ s Security Intentions in Northeast Asia: A View from South Korea,”，《中国的领土纷争》（共著）等。